

改版创刊号
2010年6月 出刊

新视界

NEW VISION

青梅煮酒 · 聚焦 2010 核安全峰会 P36

他山之石 · 文献资料搜索经验 P45

2010 毕业特辑 · 老生常谈 P48

愿同学们把这份
对国际的热情保持
下去。

张青
2010年10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学系 主办

2010年6月 改版创刊号

(双月刊)



主编：高婉妮 陈冲

副主编：

袁婷 李金潼 于洪宇 徐芳宇

编辑部成员：

董柞壮 龚秀娟 李文婷 阮艳婷

陈永 狄英娜 刘若楠 赵岩

封面设计：徐芳宇

E-mail:

nkirjournal@gmail.com

Blog: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发刊词

准确地说，这一期应当是这本刊物的“改组创刊号”，因为它的真正“创刊”是一年前由罗霞、史英男、徐芳宇等几位国政 07 级的同学热心促成的，后来出过好几期，质量渐有改进。原本是一个班的班刊，现在扩大到整个系的系刊，说明它的兴旺发达，值得祝贺。但是，饮水不忘掘井人，尊重别人的劳动，铭记别人的好处，是做人的基本品德。所以，我们这本改组后的刊物，开门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在过去发起并维持这本小小刊物中发挥作用的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班刊升级到系刊，读者群和作者群都有了很大的扩展，本来都是本科生，现在把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也都包括进去了。这一升级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刊发的文章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正如这一期的内容所见证的。然而与此同时却也存在一种需要防范的倾向，就是把本科生特别是低年级的本科生挤出这一舞台。不是有人故意要这么做，而是本科生看到有那么多“资深”学长们在上面表演，先自就胆怯了，退缩了。这里我要对本科生说两句话，第一是别服软，资历虽然起作用，但也不是绝对的；第二就是用实力说话，你的道理足，文章好，譬如像韩寒那样，不要说博士生，就是教授也只能甘拜下风。

世间刊物真不少，可真让你惦着想读的却真少。我对本刊的奢望就是，能不能把它办成一份大家都在引颈期盼、先睹为快的杂志，尽管它不连载小说。要做到这点，“三性”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知识性。知识性的含义，学术论文当然在内，但那不是重点，因为学术期刊很多，写得好自然可以找到发表的地方（我们绝不能把这份刊物办成在别处发不了的“残次”论文的倾倒地，那样的话就没人读了）。我更看重的，是一些对我们同学学习国关切实有用的资料评介或学习心得，如本期“书山有路”栏目下两篇评介新书的文章以及刘丰透露他在文献宝库中觅宝的秘笈，此外像新书介绍（“新书架”）、学界动态（中、外）、重大事件背景介绍（如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等，相信也都是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第二，是交流性，要把它办成一个可供全系师生对话沟通的平台，可以在“院系新闻”的基础上增加对教师的学术活动和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的报道，特别可以增加一些栏目让学生与教师对话，提出对系里各方面工作以及学生状况的批评、表扬、期待、建议并作出回应，让学生们能够实话实说、畅所欲言。此外，考研信息、求职信息等等相信也是同学们关

心的热点。

最后，是原创性。这是一份学生们自办的“民间刊物”，一定要把这个性质保持下去，为此，教师和学生干部要自觉保持节制，切勿对其横加干涉。否则，很快就会沦为官办（哪怕是系一级的官办），而经验表明只要一成官办，原创性就立刻消失。最近，温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让大学自主办学，让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我希望在我们这份刊物上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这一精神。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首先要不说套话、空话、废话，但有些人说惯了，你让他不说他还适应不了，这就需要我们的编辑严格把关。同时，与自由表达同时产生的，是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义务。要享受自由表达的权利，就必须学会区分言之有据的原创思想和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如果我们在开口说话前都能事先做好“家庭作业”，经过深思熟虑，就不会荒腔走板、信口开河。

总之，这是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一定要珍惜它。

张睿壮
2010年6月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学系

目录

发刊词.....	I
学人访谈.....	1
访南开国际关系学系赵龙跃教授.....	1
学生习作.....	8
理性决策与美国冷战后的海外军事干涉.....	8
试论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及其原因.....	12
书山有路.....	19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展与困境——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	19
国际政治的等级状态？——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28
青梅煮酒.....	36
聚焦 2010 年核安全峰会.....	36
国关人物.....	43
肯尼斯·沃尔兹.....	43
他山之石.....	45
文献资料搜索经验.....	45
2010 届毕业生特辑.....	48
老生常谈·飞跃重洋.....	48
老生常谈·面试推研.....	51
老生常谈·漫漫考研.....	53

老生常谈·职场点兵	57
国际关系学系 2010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	65
毕业生寄语	66
新书架	67
院系新闻	69
学术交流	69
学术活动	70
学生活动	70
主办单位简介	71
院系简介	71
老师简介	72
国际关系学系论文注释体例	76
征稿启事	81



访南开国际关系学系赵龙跃教授

【编者按】

与长者对话，只需静静聆听：在先生娓娓道来的故事里寻找一位长者半生的波诡云谲，在先生涉猎甚广的谈吐中体受一位长者渊博的学识，在先生起落的抬指间描画一位长者睿智的眉眼……俯仰之间，你已明悟。这里记录的每一句，都有几十年岁月的蜿蜒值得我们静静历数；这里写下的每一笔，也有太多的内涵与深意值得我们细细体味。字字句句满载诚挚的邀约：愿你，随我们的笔端，共同走近长者身边。

《新视界》：赵老师您好！很荣幸邀请到您参与本次的访谈。我们从前期的资料收集集中感受到您阅历的丰富，您可否结合您的求学、从政、海外学习等方面的经历与我们分享下您的体会与感悟呢？

赵：谢谢你们的采访。我求学的经历距现在已经很久了，与你们情况有很多的不同。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幸运——考上大学，就成了人才；只要能讲几句英语，就是专家了；进入国家机关工作，也不用考试。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学校和老师的推荐下，直接进入了政府部门，就职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当时国家计委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调控部门，也是对外开放领域的策划和执行机构，相当重要。那段时间我所接触到的领导和同事、所拥有的工作经历对我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我个人认为，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是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能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1991年，我很荣幸地被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我在那儿工作了八年，直接参与了许多国家经济政策出台前后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后来又调到农业部从事国际合作交流

工作，主管中美经贸合作，并参与了我国加入WTO的部分调查研究和谈判工作。这主要是因为我曾在国外大学获得硕士学位，英语比较好，我一直没有丢掉；另外在政策研究方面，我也注重国际经济动态，比较早地开始关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跟踪研究，在当时也可以算是在这方面有所专长。也是从那段工作经历中，我感觉到我们国家需要加快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和有能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事务管理的专家学者和领军人物。

《新视界》：您后来又在美国继续深造，并从事教学工作，在此期间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赵：我当时是应美国乔治敦大学约翰·杰克逊教授的邀请，去他们的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我是学习经济学的，却成了乔治敦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这种转变主要因为一方面，杰克逊教授是国际经济法学的权威，长期研究以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等为主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政策和法律问题；而另一方面，我对这些非常感兴趣，也有前面提到的一些工作经历和研究的基础。



为了能够更深入、更准确地了解和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决策机制，我同时还注册成为乔治敦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 MPA 研究生。这段学习经历收获很多，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美国的管理水平、在国际场合运筹帷幄的战略，确实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我国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要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有必要深入研究和吸收借鉴美国在国际管理方面的经验。

我原来没有准备在美国呆太长时间，不过后来乔治敦大学聘请我做外交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的客座教授，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很高的荣誉。在此期间，我给他们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了中美经贸关系这门课，主要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构，以及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当时是以一位专家的身份，介绍我国关于中美经贸合作的观点和看法，而且是从国际出版物中选择一些比较客观的研究材料作为阅读材料，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欧盟、OECD 的研究报告，以及美国的一些对中国比较友好、比较符合中国实情的研究报告。这门课很受欢迎，选课的学生比较多，对美国学生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和中美经贸关系很有帮助。后来，有几个学生被 USTR 录取了，我开设的那门课对他们帮助很大，因为对于现在的美国政府来说，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新视界》：我们注意到您的简介中有“世界银行国际贸易政策咨询专家”的头衔，可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历？

赵：因为有在中国政府工作的经历，在美国期间我也参与了世界银行的一些研究工作，很多项目都是在我的建议和倡导下设定的课题。比如“在 WTO 框架下的非市场

经济问题”这个课题，主要针对中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因为它是中国当时为了加快加入 WTO 而做出的一项承诺，这个研究对中国来说就非常有意义的。

2007 年我们就“美国首次对华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贸易补救措施的问题和影响”进行了跟踪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对中国做出“双反”调查的第一例——即 2006 年 12 月，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提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案。反倾销和反补贴是美国惯用的两种贸易补救措施，但是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一般不采用反补贴措施。后来美国认为对中国光反倾销力度不够，就又再加上反补贴。开始他们还有一些顾虑，害怕使用反补贴以后，中国会要求他们改变现行的反倾销率的计算方法，那样倾销率会大幅降低，即使反倾销再加上反补贴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效果。但是后来我们中国的工作比较被动，现在美国可以毫无顾忌地采用双重的贸易补救措施：反补贴、反倾销两个税率加起来最高的曾超过百分之六百，遭受这样高的双反关税的任何产品都不可能再进入美国市场。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在世行组织了这项研究，这对中国政府以及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另外我也注意到，中国从 2001 年加入 WTO 后，在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发展较快，特别是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我们就“中国的区域化自由贸易政策”做了一个研究。世界银行的研究主要是为其成员国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所以我们在研究报告中也为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需要重视和改善的政策建议，比如增强区域贸易协定文本的严谨性，以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争端等。有几次我们专门回国，就我



们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商务部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应该说是很有实效的。

总之，我感觉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做客座教授，讲一些我们想讲的内容，在世界银行参与研究工作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新视界》：您在学术研究和外事实践中都成绩斐然，真的让我们非常敬佩。您刚才也提到了在国外做学者和官员的身份问题，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是如何做好从政府官员到研究学者之间的身份转换的？

赵：成绩斐然不敢当，但是“身份转换”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中国和美国在这些方面差别很大。美国的学者和官员交流频繁，所以不存在所谓的“转换”问题。他们的用人机制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系统：总统、政府官员每四年一换，相应的主要官员很少有干满四年的，可能不到四年就已经更换了。政府需要的高端人才，可以直接从全国选拔任用。这些高端人才在离开政府部门以后，又充实到全国的教学研究和企业中去，相得益彰，发挥着很好的作用。

我国政府部门相对闭塞，进入渠道基本上只有一个，每年从高校和社会上招考一定数量的毕业生充实公务员队伍，直接从其他部门选拔专业人才出任高级主管领导的很少。其实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是政府部门都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它既是一个让专家人才发挥作用的舞台，又是一个培养提高人才的基地。就此问题我曾经也与美国官员交流过，他们在一生中也是希望有机会花一定的时间做公共服务，他们称为“public service”，这是实现他们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部分。区别在于，美国的这些管理人才并不局限于

在政府部门工作一辈子，比如从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到退休，从考上公务员然后当办事员、科长、处长、司长等直到退休，他们觉得这样损失很大。政府部门既然是一个掌握信息、锻炼和提高人才的地方，它既可以在你身处其中工作时让你发挥作用，也可以在你离开岗位后让你将所学知识和能力在别的行业里面继续发挥作用。

对于美国人来说，今天是大学教授，明天也许直接就是总统办公室主任，这是很自然的。比如说乔治敦大学的一位研究亚洲事务的教授，先前并没有在政府工作过，却被布什总统直接任命为总统办公室安全事务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几年以后又回到学校，继续做教授。原来他作为教授，给学生讲解、研究美国的亚洲政策；到了安全委员会他就真正参与了决策，比如朝鲜的核问题、中国问题等等；然后又回到学校，再次给学生讲美国的亚洲政策，就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认为我国应该研究借鉴美国的这一套做法。目前我们的这种用人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全球化时代。对于急需的一些专业人才，可以从全社会公开选拔，而不仅仅是内部选拔再去培养，那样有时来不及，可能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我国政府应该研究适当开放公共管理部门的高级职位，而不仅仅是办事员，形成一个“培养-使用-培养”的良性循环体系。现在世界变化快，知识、人才赶不上国际局势的变化是正常现象，所以有必要根据岗位的需要，及时从全社会选拔专业人才来领导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新视界》：您刚才提到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师长对您的影响非常大，我们注意到您在乔治敦大学师从约翰·杰克逊教授，也



翻译了他的《国家主权与 WTO》这本书；翻译这本书有什么特殊的契机吗？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希望通过这本译著在对外交往方面为中国提供些许启示呢？

赵：约翰·杰克逊教授是世界国际经济法学的顶级大师，被学界誉为“世贸组织之父”，经过几年的密切交往以后，我对这位老人更加尊敬。他的成名作发表于 1960 年代初，1975 年首次出版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被作为欧美英语国家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教材。我在乔治敦大学还选修了这门课，杰克逊教授亲自主讲，选课的人非常多，阶梯教室座无虚席。

杰克逊教授本来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1996 年到退休年龄后，他退休但没有辞职，工作还在继续；后来被挖到了乔治敦大学法学院，成立了国际经济法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他同时创立了《国际经济法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并任主编至今。《国际经济法杂志》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经济法学界最高级别的杂志。杰克逊教授已经 70 多岁了，不仅每年继续开设两门课程，而且仍然是笔耕不辍，新著不断。世界各国有很多重要的场合都邀请他做演讲，每次演讲都非常精彩。在演讲时他就拿简单的几张纸片，但之前他都认真精心地准备，所以每次都精彩纷呈，而且都有新的内容。杰克逊教授真可谓著作等身，我们国内最近几年也有部分的译著，比较早的有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翻译的《世界贸易体制》(《World Trade System》)。

《国家主权与 WTO》正式出版于 2006 年，此前我已经看到过它的初稿。该书是杰克逊教授在剑桥大学法学讲座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我觉得它很好地总结了杰克逊教

授终身的研究成果；书中所研究的也是中国需要考虑和研究的问题。所以在书还没有问世之前，我们已经达成了翻译出版中文版的意向。当时我们决定引进这样的专著，不是为了赢利，就是希望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国际社会对于国家主权与国际机构的研究成果。2006 年 4 月英文版发行以后，我们马上开始行动，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左海聪教授也参与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我们对杰克逊教授的认同和尊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坚持倡导重视国际管理体制的思想。他虽是美国人，但他也认为仅靠美国不能解决目前国际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希望美国能够遵守国际规则。比如他认为，WTO 争端解决机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美国能否执行 WTO 的决定。因为只有美国（有能力）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当然总体上美国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败诉的案例中还是执行（较多）的，但是前提是他们赢得多，输得少——因为他们有这个实力，而且他们在具体案例中确实显示出了其专家队伍的水平。包括与中国的几个案例，基本上都是他们得胜；我们输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符合”WTO 的规则，而是要在如何胜诉方面多做工作。

另外，这本书讨论的内容正好是我们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化管理所需要研究和了解的问题。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化管理不仅是我们维持和进一步争取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量都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怎么能对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化管理不闻不问呢？这就相当于制定交通规则，制定规则不



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全球系统的安全。在过去的 20 世纪中，美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而实现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我们也要研究借鉴美国的经验，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还有一点，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经济体——中国不为自己说话，没有第二个人为我们说话。因而中国必须要制定既适合我们的国情、同时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规则，这是我们义不容辞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研究国际化管理就面临一个国家主权与国际组织机构的问题。我们国内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了解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杰克逊教授在书中广泛综述了有关专家对此问题的各种看法，论述了他自己的所谓的“现代主权观”，并提出了“权利合理分配”的解决方法。总之，这本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和法律等多个领域，对于我国从事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学术研究和企业管理的专家和学者理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政策和法律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你们学习国际政治，应该花一些时间看看杰克逊教授的这本书。

《新视界》：听了老师的介绍我们也觉得这本书对于中国在 WTO 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的行为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一定会好好拜读一下。另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也的确面临越来越多的冲击，比如这次经济危机，近来热点的人民币升值问题等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压力与挑战的？

赵：关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多。这实际上与上面我谈到的译这本书的一些想法，甚至是我到美国的学习都有关系。在做政策研究和国

际合作这两块工作时，我就深深感觉到中国在参与国际化管理这方面确实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论我们怎么承诺“和平崛起”或“永不称霸”，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特别是 2008 年首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和消费都明显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受其影响较小，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走出了衰退的阴影。特别是我国的一些大款给美国人的印象是挥金如土：今年春节期间，我国组织了上千人的旅行团去美国纽约，据报道人均消费 6000 美元，美国人很受刺激。因而有些美国人就产生了“中国一夜之间暴富，靠的就是美国的市场”的心态。

实际上，中美经贸合作给美国带去的好处更多。贸易带动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好处的分配是不均等的。拿美国工人来说，如果就业于出口竞争型的产业，自由贸易开拓了国际市场，自然得益；但如果是在传统产业或者面临进口竞争的企业，很可能关停并转，这部分工人就得不到好处，甚至受到负面影响。美国对这部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非常关注，制定了各种贸易救济法律，通过实行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等来保护国内有关企业，通过失业救济法等为他们提供培训、再就业等免费服务。我们需要面对这些现实，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有一些调查和付诸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说一直是美国的一张牌。我个人认为美国实际上对人民



币升值的要求没有那么迫切，他们真正希望的是建立人民币汇率的自由兑换机制。我们在与美国博弈时，应该真正研究了解美国的真实意图——这就是国际谈判——谈判桌上是真真假假，你一定要了解桌子下面的条件和真实意图。

《新视界》：接下来转入比较轻松的话题。您现在应该算是一位“新南开人”，那么您最初是缘何与南开结缘？又是什么吸引您步入南开园，走上了南开的讲台？南开给您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还有您在南开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怎样的？

赵：其实这就是缘。2008年5月在我回国出差期间，曾应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左海聪教授的邀请，来学校做讲座，当时还有我们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几名教授参加，席间也聊到了可否来南开工作的话题。南开是我国的著名学府之一，当然很有吸引力了。我也在考虑回国以后做什么，鉴于我在美国的这段教学研究的经验，再加上我一直有一个“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的情结，所以萌生了来南开执教的念头。我非常感谢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各位师长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也相信自己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工作经历，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会有帮助的。而且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的阶段，越是在这个阶段越是需要人才、需要我们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在这样的时刻，能够正式加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确实希望能在南开做一些事情。我前面提到，中国需要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化管理方面培养更多的人才，组织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我也很希望在院领导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位师长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在这两个方面有所作为。这个学期，

我已经给我院的研究生开设了《国际化管理与中国》的课程，下一学期我将为我校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以中美经贸关系为分析的对象。今后还计划开设《WTO 与国际贸易谈判》等专业选修课程。除此之外，我们正在努力争取资源，准备成立一个研究中心。

《新视界》：作为南开人，我们欢迎和感谢您加入南开关系这个大家庭。最后请您谈一谈您对国际关系的学生有什么建议或者希望吧？

赵：好的。我首先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自己的大好时光，能够尽量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南开具有非常好的教学科研氛围，你们要好好珍惜并从中汲取养分。

第二，要正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把他们看作是在我们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改革开放阶段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们年轻人要有理想和追求，要努力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贡献，绝不做拜金主义奴隶。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理想，还要为自己的理想努力。

另外，对国际关系的学生来说，国际视野、全球思维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还要考虑对于世界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有一个广袤富饶地大物博的国家，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有13亿的同胞。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的最大竞争力是我们潜在的消费市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锁我们，也不愿意放弃中国的市场，这种优势没有谁能取代！

单单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还不够，我们还要有行动，要掌握与世界其他国家交流的语言——一定要下功夫学好英语。不是一般的学好，要尽量做到发音标准、理解准



确，并能够用英语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如果语言掌握得不好，就会闹笑话，甚至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最近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来华访问，我们就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采访了他。鲍尔森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有好处的”，第二句是“我支持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我们有些媒体就说鲍尔森是支持中国维持人民币现状的，实际上忽略了支持的前提。他实际要表达的完整意思是，升值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根据自身情况当然会选择升值了，他就支持我们的决定。由此可见，语言在国际交

往和国际谈判中是多么的重要。

在具备了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的基础上，积极付诸于行动，熟练地掌握了语言等工具以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做一个真正能够奉献国家奉献社会的人，做一个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就像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对年轻学生要求的那样：“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我想这也正是国家和时代对你们的期望。

【后记】

从前期接受访谈邀请的欣然，到一个多小时深沉而不乏轻快的深度交流；从简明而及时的邮件回复，到百忙中抽出时间对初稿细致至标点的修改，我们惊讶于赵老师的平易与亲切，也深深折服于他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儒雅的长者风范。漫谈海外的求学、任教，他感慨自己的幸运，我们却能感受他的拼搏进取与执着坚韧；粗略历数学术案例和外交谈判经历，他始终坚持“我们还做的不够”——谦逊背后更有着对于中国的外交外事从学理到实践的审慎考量与深度思索。得与这样的长者畅谈交流，我们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携半生的真知与卓识步入南开园，他更是引用校友温总理的一句“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将热望寄予后辈——这意味深长的嘱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铭记，共勉……



理性决策与美国冷战后的海外军事干涉*

王鹏伟**

摘要 冷战后，国际政治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由两极变为单极。在此变化下，美国实施全球战略，积极进行海外军事干涉，用美国的意识形态改造世界，旨在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其外交政策变化是建立在对国际结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的，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其中，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是根本性因素，意识形态、人权主张等仅仅是其实施扩张战略的工具。在国际结构力量分配没有再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是不会停止的。

关键词 理性决策 单极秩序 海外军事扩张 科索沃战争

源于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或者理性人假设，为解释人、集团联盟、国家的行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出发点。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特定的条件框架中，经济人会根据现有的条件，确立目标并分析能够达成目标的可能途径，并对各个备选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最终得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即理性结果。冷战后的美国，从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的外交政策的选择，尤其是其扩张策略的实施，都是以冷战后国际政治结构由两极变为单极为客观背景，经过权衡成本收益，作出的理性决策。具体表现为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推行全球战略，试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一、理性决策模型的内涵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奠定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决策的模型(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Model)。在面临某一问题时，理性人会根据客观的前提条件，确定自己的目标，并将目标分主次先后。在确立了目标之后，决策者会根据既定目标制定相应的可供选择的策略，通过总收益(Total revenue, TR)与总成本(Total cost, TC)，以及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 MR)与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MC)的比较，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并予以执行。经济学中的垄断市场供给方——厂商的决策依据：一方面是厂商是否进行生产的权衡，即TR与TC的比较：当 $TR > TC$ 时，厂商进行生产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他们就会进行产品供给；当 $TR < TC$ 时，对于厂商来说无利可图，所以厂商不会进行生产；当 $TR = TC$ 时，对于厂商来说无所谓生产与不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多少的权衡，即MR与MC的比较：当 $MR > MC$ 时，厂商增加一单位的产出能够使得收益增加，随着产出的

* 本期“学生习作”栏目刊登的两篇文章是张睿壮教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的“美国外交政策”课程的期末作业。

** 作者简介：王鹏伟，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7级本科生。



增加, MR 会逐渐下降, 而 MC 会逐渐上升, 最终直到 $MR=MC$, 收益达到最大; 当 $MR<MC$ 时, 厂商会采取相反的策略使得其收益增加, 直到 $MR=MC$ 。所以最终的均衡状态是 $TR>TC$, $MR=MC$ 。理性人的假设以及决策原则不只是经济学领域的专利, 还可以用来解释国家行为。

理性决策的模型是理性人在客观性条件基础上, 进行主观性分析, 最后产生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的分析模型。问题是客观性条件和主观性条件之间孰轻孰重? 笔者认为客观性的条件是主观选择的根本依据, 是一种结构 (structure); 理性人则是主观的施动者 (agent), 在结构中选择最佳方案, 但不会超出结构的限制。在理性决策的过程中, 结构性的条件因素是具有根本性解释力的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在一定的国际结构中所进行的对外活动, 面临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成本如军费、海外经济援助等, 收益如能源收益、软实力提升等)。国际结构的类型以及其在该国际结构中地位的决定其 TR 、 TC 、 MR 、 MC ^① 分布的状态, 根据收益最大化的决策原则只要 $TR>TC$, 国家就会进行海外活动, 并且只要出现 MR 不等于 MC 的情况, 该国就会调整战略, 或增加或减少海外活动。用理性决策的模型来解释美国冷战后的外交策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冷战后美国进行海外军事干涉的理性决策分析

从里根时代的美国采取进攻性的战略, 到最终苏联解体, 国际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两极变为单极, 国际力量分配发生了调整。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 无论是从军事、经济、还是文化软实力都绝对大大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成为“孤独的美国”^②。此时的美国是国际结构中的垄断者 (Monopolist), 这一国际政治力量变动的大地震深刻影响了其对外政策。

根据冷战后的国际力量结构, 美国确立其对外战略, 面临的战略选择有传统的孤立主义、多边主义、均势、以及建立单极霸权秩序。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威廉·沃尔弗斯进而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单极世界的稳定性》一文, 发展了霸权稳定论, 形成单极稳定论。^③ 受其影响, 美国外交决策者权衡各个战略的利弊得失, 最终选择追求建立并维护单极霸权, 这是理性决策分析成本——收益的结果, 单极秩序是对美国最为有利的秩序。世界无政府状态下,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无偿提供公共品, 这同样是理性的结果。在单极霸权秩序下, 唯一的霸权国家能充当“世界政府”, 为世界提供公共品, 这是霸权国家维护其霸权秩序的总成本; 与此同时霸权国家从世界范围内获取各种资源、利益, 也即霸权国家的总收益。按照霸权稳定论的观点以及理性决策原则, 只要霸权国家从世界获取的总收益大于其维护霸权秩序的总成本, 霸权国家就愿意维持秩序, 秩序就能趋向于稳定, “美国治下的和平”就有实现的可

① 这里的 TR 、 TC 、 MR 、 MC 仅指某国家采取何种外交政策的成本收益。

② 肯尼斯·沃尔兹:《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韩召颖、刘丰译),2004年第4期。

③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5-41.



能。冷战后的力量格局为美国建立单极秩序提供了可能，权衡各个战略的成本收益，建立单极霸权秩序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

在此种目标的推动下，美国冷战后的历任总统的海外军事干涉的策略也就顺利成章。但师出无名非理性，霸权的维持不仅仅需要硬实力的控制，还需要软实力的渗透，建立意识形态的霸权也就成为美国海外战略的必备内容。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新保守派的外交理念。脱胎于自由派的新保守派，继承了自由派主张的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但抛弃了自由派坚持的纸面上的民族平等和自决。^①里根时代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体现了新保守派的融意识形态与实力外交为一体的理念，到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结构形式则更为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新保守派的具有侵略性的外交理念，有助于美国实现单极秩序的目标。至少在冷战后出现大片意识形态和权力真空的世界中，外交决策者吸纳新保守派的理念，其理念一旦实现能使美国利益实现最大化，是理性的选择。

到克林顿上台之后，进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新保守派遭到冷遇。克林顿崇尚实力基础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在美国领导下，国际间分担责任，同时热衷于人道主义干涉。与新保守派的具有侵略性的理念相比，克林顿的理念显得比较缓和，似乎更加“人道”。但是克林顿的人道大棒，实为干涉黑手。克林顿的外交目标的变化与新保守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为在国际力量分配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其基本目标没有变化，手段也没有大的变化，同为军事干涉，变化借助的是“理念”。前者更加灵活，后者则更具刚性。将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布什时期和克林顿时期外交理念有所不同，但却都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因此可以断定意识形态因素、价值观因素对美国进行海外干涉不具有根本的解释作用。两位总统采取同样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冷战后国际力量结构分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垄断者地位使得其进行海外干涉的总收益要远远大于其总成本。此种情况下，美国目标既定，即建立美国治下的单极秩序。

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发生于科索沃的“人道灾难”，成为美国进行人道干涉的“理由”。事实证明，在科索沃地区并没有发生美国人声称的针对阿尔巴尼亚人的“人道灾难”；相反，美国的人道主义干预却带来了更多的人道灾难。^②克林顿的“人道主义”干预，是假人道主义之名，行干涉主义之实。但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干涉科索沃？跳出具体的人道问题，看美国与南联盟的关系，两国关系的现状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至少对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而言，南联盟并没有顺从美国的意思，并且是反对西方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并且不符合美国按照美国理念建立全球秩序的要求。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联盟与美国对立，是美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因素。南联盟在国际上对美国的不顺存，妨碍了美国全球利益的实现，所谓解决人道危机，不过是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借口，海外军事干涉

^① 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第47-48页。

^②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11-113页。



对美国而言是必要之举。1989年布什政府借禁毒之名入侵巴拿马，根本上讲，和美国入侵南联盟的与原因是一致的，美国在建立霸权秩序的过程中，必然需要消灭反对力量。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外交评论家阿瑟·施莱辛格曾总结：“美国政策的功能就在于根据其他国家对我们规则的恭顺程度对它们或贬抑或褒扬。”^①选择性的进行军事干涉，也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高明”手段。

比较冷战前后美国进行海外干涉的次数，不难发现美国冷战后海外干涉的次数要多过于冷战之前，这也是由冷战结束前后两种不同的国际结构所决定的。冷战结束前，国际社会有两个垄断者，美国受到了苏联的制约。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进行海外干涉的总收益要大于其干涉的成本，美国进行了海外干涉，但是由于其干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水平较低，这就决定了其干涉的次数相对较少。而到了冷战结束，国际社会中只剩下一个垄断者，此时之前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被打破，边际收益大于了边际成本，所以增加海外的干涉，对于美国来说是利益的增加。所以冷战后美国海外干涉次数比冷战结束前的增加也就不难理解。

三、美国全球战略的后续以及前景

冷战之后的海外军事干涉并没有随着总统的换届，外交理念的变化而减少，小布什时期新保守派重新站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桥头堡，9·11事件则为美国以新的名义——反恐，进行全球军事干涉创造条件，尽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使得新保守派走下神坛，但美国全球军事干涉的脚步却没有就此停下。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决定因素的主客观性的分析，有助于找到决定美国战略步伐的根本原因。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外部环境，客观性因素；同时在美国国家内部，传统的美国“优越论”、“特殊论”，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因素，再加上美国决策层个人偏好构成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内部因素。权衡主客观因素的重要性，不难发现，如果没有现存国际结构的存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推行全球战略。比较历史上的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二战之前奉行孤立主义，国际格局尚处于英国秩序下，美国实力尚不足以建立美国秩序；二战之后，美苏对抗，双方尽管都试图击溃对手，但势均力敌的两极国际结构，使得双方都谨慎扩张。而当冷战结束，单极结构的来临，美国建立单极秩序的机会也就诞生。国际力量对比的客观现状也便构成了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构因素，在此种结构下，只有建立并维护美国霸权秩序，才能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才是理性的决策。

在可预见的长期内，美国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的现实还将延续，国际力量的对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美国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的目标也不会改变，为推进美国治下秩序的建立而采取的海外军事干涉也不会停止。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为了国家利益》，《世界观》1984年12月号，第5-8页。



试论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及其原因

左超*

内容提要 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趋势并不是直线下降，而是呈现出一种有所起伏的变化趋势，在不同时期其正当性的变化是不同的。老布什时期，美国霸权的正当性甚至比冷战时期还有所增强，但是，在克林顿时期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基础开始受到严重腐蚀，到了小布什时期更是几乎丧失殆尽，而奥巴马的上台却似乎又为美国霸权正当性的恢复带来转机。但是我们也可以预言，美国不会任由其霸权的正当性肆意流失，当然正当性的塑造和恢复也非一日之功。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结构变化、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变化、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变化等三个方面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进行分析。

关键词 霸权正当性 美国霸权 冷战后

冷战后，有关美国霸权的讨论几乎都认为其正在遭遇正当性危机，但是，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并不是直线下降，而是呈现一种有所起伏的变化趋势，在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正当性的变化是不同的。美国霸权的正当性是在逐渐流失还是在继续维持甚或是增强？如果是流失，那么其程度如何？其过程如何？其原因又是如何？如果是继续维持，原因又是什么呢？所谓的“新罗马帝国”，其霸权正当性的变化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所致？笔者将从国际政治结构、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等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内涵

我们首先要对“霸权”和“正当性”做一简要说明或者说限定。按照学者张睿壮的研究来看，只有“良性的霸权”或“善意的霸权”才有“正当性”可言，^①这里的“良性”和“善意”，笔者认为是一种特定国际秩序状态下的霸权国家能够进行一种全球善治，主要表现为霸权国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尤其是提供一套相对公平的秩序运作和维持的制度并确保其得以“合法”实施。关于“正当性”的理解，张还认为“正当性”比“合法性”更能涵盖良性霸权的道德期待和价值期待，^②所以更倾向于用“正当性”一词。简军波和张敬林的研究也强调对霸权国的价值和道德诉求。^③笔者在下文除了强调合法性和道德性以外，再补充一条，那就是霸权国要为其追随者提供一套共享的价值，这一点对霸权正当性的维持也是极其重要的。

*作者简介：左超，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① 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第4页。

② 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第2页。

③ 简军波，张敬林：《自负帝国的危机：单边主义与霸权合法性的终结》，《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第37页。



相关研究已经很详尽，这里不再赘述，在总结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笔者提出以下看法：美国的霸权基本可以归为良性的霸权或善意的霸权，正当性的存在也是可圈可点的。霸权的正当性应该具备三点内涵：其一是合法性，即霸权国要遵守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范，遵守国际法，尤其体现在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守上，因为联合国在法理上应是当今世界上最权威的最具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其二是霸权国要为世界做出道德上的期许和榜样，为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筹集诸如和平安全保障体系、稳定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完善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发展援助体制、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案等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其三，使它的领导地位合法化的一套价值也即与其追随者分享的那套共享价值。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在其主导下提供的一系列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运作秩序、制度和规范，完整意义上还应该包括美国为确保这些秩序得到应有的遵守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或非强制行动。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正当性是在逐渐流失还是在继续维持甚或是增强？如果是流失，那么其程度如何？其过程如何？其原因又是如何？如果是继续维持，原因又是什么呢？下文将根据以上三点内涵分时段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进行考察和分析。

二、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

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变化并不是直线下降，而是一种有所起伏的变化趋势。老布什时期，美国霸权的正当性甚至比冷战时期还有所增加；克林顿时期，较之老布什时期，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小布什第一任期，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几乎损失殆尽，岌岌可危；第二任期，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流失采取了一些补救性的政策和行动，但为时已晚，美国霸权的“光辉形象”已受到严重玷污，正当性也是遍体鳞伤，亟待修复；奥巴马意识到了重塑美国霸权正当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履新以后，便积极行动，他的努力也许会使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得以挽回一部分，但是这也要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局面。但是我们可以预言，美国不会任由其霸权的正当性肆意流失，当然正当性的塑造和恢复也非一日之功。

老布什上台后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①其主要内容虽然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并按照美国模式来塑造世界，但仍然注重盟友和国际组织的力量和作用，在国际事务中仍然注重联合国的协调作用；虽然强调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但认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军事手段。“海湾战争”可以佐证此时期的美国政策，这是一场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和主权完整而进行的合法且正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正是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的，其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权威的举动不仅得到了其所有盟友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冷战期间的敌方阵营成员的支持，从其追随者数量来说，可谓前所未有的，美国霸权的“正义”和“善治”形象几乎得到了神话般的赞扬和支持。从这场战争的性质、过程和追随者来看：首先，联合国安理会的动武授权使美国霸权正当性符合合法性标准；美国为了保护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动员了集体防卫力量，提供了一种安全保障体系和秩

^① 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4-73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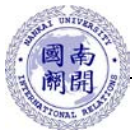


序,也即提供了一种安全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说明美国霸权为其追随者提供了一套分享价值,这些分享价值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等。由上分析可得出,此时美国霸权的正当性甚至比冷战时期还有所增加(原来的敌方阵营甚至也接受其正当性地位的事实)。

克林顿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极具自由主义的进攻性特征,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科索沃战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维护人权、制止“种族清洗”的旗号,对南联盟进行了70多天的狂轰滥炸,实际上却以其虚假的人道行为导致了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与海湾战争不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一时期,美国频频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准则,其霸权正当性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严重损伤;在波黑问题上开始与其欧洲盟友发生分歧,其追随者开始反思;在科索沃问题上更是与安理会大国俄罗斯和中国发生严重冲突,甚至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都显示出美国霸权与其追随者和默认者开始有分道扬镳的趋势,它所提供的一套分享价值已受到其盟友和其他追随者的怀疑和挑战;至于这一阶段美国霸权可圈可点的行动,就是美国为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所做的一点贡献,完成了GATT向WTO的转型,勉强可算是美国为国际社会所提供(用“筹集”似乎更为恰当)的一项国际公共产品。较之老布什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高举反恐旗号,迅速炮制出“布什主义”,推行“先发制人”军事战略和“单边主义”外交方针,^①肆意破坏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几乎完全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不顾俄、中、法、德等大国和盟友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抛开联合国,几乎独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布什政府坚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极端黩武主义的鲜活案例。拒绝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甚至破坏和阻碍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唯美国之利是从,退出《反导条约》、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物武器条约》、拒绝拥护国际刑事法院等等单边主义举措,严重腐蚀了美国霸权正当性的道德基础。美国的种种野蛮表现使其盟友感到厌恶,尤以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欧之间的裂痕为证,美国所提供的这种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价值观念令欧洲盟友所不齿,更何谈与其分享。历史证明,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几乎损失殆尽,岌岌可危。在其第二任期内,布什政府做出了一点调整,尽量加强与盟国的协调,在伊拉克最后重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美国想让盟国承担部分重建义务。但是小布什的调整远不够彻底,单边主义还在继续,还在强行输出自己的“美国梦”,通过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和支持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加紧对外渗透扩张,填补地区性权力真空,排挤其他大国的势力。美国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新布什主义”关于在全球推进自由的主张只不过是“传教士式的狂热”

^① 萨本望:《“布什主义”四处碰壁》,《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1期,第17页。



和“乌托邦式的梦想”。^①小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流失采取了一些补救性的政策和行动，但为时已晚，美国霸权的“光辉形象”已受到严重玷污，正当性也是遍体鳞伤，亟待修复。美国选民和世界人民迫切期待一个新时代的出现。

主张变革的奥巴马，意识到重塑美国霸权正当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履新以后，便积极行动，努力恢复与传统盟友间的关系，对欧洲的窜访，对日本访问，都明确表达了对盟友的尊重和倚重；修复与大国的关系，希拉里和奥巴马先后对中国进行访问，希望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与协商。这些动向都表明奥巴马政府注重“多边主义”和重视盟友的意向。不过，美国在2009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不尽乐观的表现，还是显示出了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本质：世界人民不能和美国人追求的相抵触，但美国人可以与世界人民所追求的相抵触，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必需首先是美国的“私人产品”。王鸿刚认为，从表面看，“和解”、“合作”与“和谐”是奥巴马政府“百日外交”的最大特征，^②这些特征也许是美国霸权正当性急需的补品。但是这种“和谐”的局面能够持续多久还没有答案，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和扩展，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向一些新兴国家发难，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不断爆发，还力促人民币按其预期进行不合理的升值，以减少美国的损失。这种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做法会严重腐蚀其霸权的道德基础。奥巴马的努力也许会使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得以挽回一部分，但是这也要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局面。但是我们可以预言，美国不会任由其霸权的正当性肆意流失，当然正当性的塑造和恢复也非一日之功。

三、美国霸权正当性变化的原因

美国霸权正当性变化的原因也许有很多种解释，本文只选取三个角度：国际政治结构、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国内政治思潮。之所以选取以上三个视角主要有如下考虑：第一，考虑到分析变量的全面性和层次性。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可以从结构层面去分析美国霸权正当性变化的宏原因，可以剥离出导致这种变化的结构性自变量；而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变化分析则可以把国家视为一个理性的统一体，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人”概念，假设国家做出的对外政策选择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这样就不必打开国家这个“黑匣子”，可以很轻松地控制核心变量，以避免分析上的困难；最后则选取了国家这个黑匣子内部的一个变量即国内政治思潮，而且这个变量对美国政策变化作用极其巨大，故选取之进行分析。第二，前两个因素是考察一国国际行为的常用变量，本文也认为这两个变量对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当性变化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而国内政治思潮则是针对美国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安排的一个考察分析变量。

1、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

冷战期间的两极结构对美国霸权正当性影响可谓是积极的，冷战后的结构变化（由两极到一超多强或单极独霸）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影响是消极的。沃尔兹认为，结构的变化导致

^① 萨本望：《论“新布什主义”》，《和平与发展》2005年第2期，第8页。

^② 王鸿刚：《奥巴马“百日外交”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5期，第46页。



行为体行为的变化，“结构限制和塑造了行为体，然而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某种结果，而是间接地通过两种方式产生影响：行为体的社会化和彼此间的竞争”。^① 冷战期间，发生在各自阵营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使得各方成员对其领导国的霸权规范产生了认同，因为结构会奖励遵守规范的成员而惩罚违反规范的成员。美国为其阵营提供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的规范得到了内部成员的认可和自觉遵守，从而使其霸权的正当性得到维持。而两大阵营的竞争更是使美国霸权获得了正当性的另一个结构性来源。根据张睿壮的研究，这种竞争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两极霸权国竞相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二是体系内的成员通过比较发现美国模式优于苏联模式，^② 这就大大增强了美国霸权的正当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两极变为一超多强、或者单极独霸甚至是多极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使敌对阵营内部成员社会化的影响减弱，更使竞争的途径几乎消失。苏联的解体使美国维持其霸权正当性的结构性原因不复存在。美国一下子成为了真正的帝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硬权力和软权力，但这也使得美国站在了危险的境地：它突然之间不知所向，而且这种一己独大的地位会使其产生孤傲蛮横的心态。查尔斯·库普乾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成了一个茫然失措的大国”。^③ 老布什和克林顿面临巴尔干种族冲突的不知所措，先是留给欧洲人自己处理，然后又接手过来，剥夺了欧洲盟友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发言权。莱斯曼（Reisman, W. Michael）沿着相当传统的现实主义路线，提出“国家越大，其权力也越大；越是选择双边外交而不是多边外交”，^④ 布赞按这种逻辑提出了一种预期：“只要有可能的话，唯一超级大国将会采取单边行动，而且偏爱于双边外交而不是多边外交。”^⑤ 倚仗自己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综合实力，结合由此而生的孤傲蛮横心态，美国逐渐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并采取了大量的单边行动，正是这些单边行动不仅挑战了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也使其盟友对其提供的一系列共享价值产生了怀疑，这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削弱是极其严重的。克林顿时期的“新干涉主义”尤其是小布什时期的单边主义“反恐”政策和激进狂热的“推进民主自由”的政策几乎使美国的霸权正当性丧失殆尽。

2、霸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变得稀缺，因为苏联原来提供的一部分也要由美国来承担。这样美国所处的“集团”就是一个在规模上扩大了了的“集团”，几乎涵盖了全球范围，美国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由于“集团”的扩大而发生了变化。根据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集团越大，公共产品就越稀缺”，^⑥ 因为“由于集团越大，任一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

① 肯尼斯·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② 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第6页。

③ 查尔斯·库普乾著：《美国时代的终结》（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④ Reisman, W. Micha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rvival*, Vol. 41, No.4, pp.62-80. 转引自巴里·布赞著：《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⑤ 巴里·布赞著：《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92页。

⑥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Schocken, 1968), p.35;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text. Quoted in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3, 1992, pp.681-708.



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① 这样一来就没有成员愿意提供公共产品，而且集团越大，组织成本越高。美国虽说是其二战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最大赢家，但是冷战结束后要求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员急剧增加，但是美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却在减少，一些国际制度的延续使其他国家享受到了“搭便车”的好处，自己却在吃“哑巴亏”。曼瑟尔·奥尔森还认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鼓励的内容），也可以是消极的（惩罚的内容）。^② 冷战后，国际公共产品领域就缺乏这样一种安排，以致美国没有像冷战期间一样因提供公共产品而获得额外的收益激励，基于成本收益考虑，美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霸权稳定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认为，霸权自耗是必然的，他为美国延缓这种自耗进程提出几个药方，其中之一就是主动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这也许是美国基于保存实力的一种无奈选择。^③

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许多国际机制或制度，而这有时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所以美国更倾向于改进甚至是抛弃这些制度或机制。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认为，制度一旦被创立起来就会形成一种自动维持的惯性。而这种制度惯性有时会成为美国自由行动的障碍，所以在冷战后的十多年里，美国常常会降低、退出、拒绝参与或反对多边主义计划。玛莎·费尼莫的研究认为，由于单极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得一些物质性力量不起作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单极权力的制度化”，单极霸权国尽管可以创建这些制度并使其符合自己的偏好，然而，这些制度一旦建成运行，则会具有自己的权力和内部逻辑，单极很难对其进行控制。^④ 这也许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宁可冒着风险也要退出一些制度安排的原因，进而可以解释冷战后美国为什么不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尤其是倡导建立一些领域的国际制度而宁愿选择单边主义或双边协议。

3、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笔者认为其中对美国霸权正当性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新保守主义的卷土重来；国际主义的退却；国家利益观的演变。

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里根时期，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的出现了一支新军即“新保守主义”。^⑤ 但在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新保守势力又遭遇低潮，他们一直等待时机兴风作浪，小布什的上台和9/11事件的到来终于使苦苦等待的他们看到了大有作为的“天赐良机”。张睿壮认为，新保守主义“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扩张性和进攻性”，在外交方面崇尚

①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转引自陈刚：《集体行动逻辑与国际合作——“京都议定书”中的选择性激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03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5月，第20页。

②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42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④ Martha Finnemore, "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1, 2009, pp.58-85.

⑤ 张睿壮：《保守主义及其在美国的演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1期，第41页。



武力的使用和意识形态的输出。^① 克林顿时期的“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人道主义干涉”等等理论和政策都与“新保守主义”的煽动和鼓惑是分不开的。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势力更是占据政府要职，实力空前，以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进行所谓的“反恐战争”，推行全球民主计划，不遗余力地推进“大中东计划”和“颜色革命”，改造伊斯兰世界，改造所谓的“前哨暴政国家”和专制国家，其中阿富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就成为了美国的最大牺牲品。这给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心理创伤：美国霸权还是一个“善良”和“正义”的霸权吗？它的正当性还存在吗？这给美国霸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国际社会接受其霸权的意愿和程度大打折扣。

国际主义的退却。美国历来有“孤立主义”的传统，随着冷战“旧日好时光”的结束，美国再也无法用“冷战共识”来团结其民众对其国际政策的支持。查尔斯·库普乾认为，“冷战的结束和主要对手的缺席已经逐渐进入美国国内政治的循环系统，尽管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削弱着美国人对过去不久的全球激进主义的支持。”^② 美国人面对主要威胁的消失开始认为应该收缩其全球战线，减少一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面对国际主义的成本不断上升，国内要求美国退出世界其他地方的事物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查尔斯·库普乾还认为，“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势力怂恿美国放弃成为共识和联盟的倡导者和创建者”，“吝啬的国际主义与刚愎的单边主义一起构成了一个致命的组合，两个领域的最糟组合。”^③ 这就导致美国霸权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其追随者对“老大哥”的不满情绪急增，进而侵蚀其正当性的社会基础。

国家利益观的变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不可忽视。潘亚玲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人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和中立的”，不应当受到大众舆论和个人道德的影响。^④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有极大的道德征伐色彩，克林顿时期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和推进全球民主自由，其实就是认为美国的价值标准放之四海而兼准，这些政策的实施结果就是挑战传统国际法和国际准则，肆意侵犯别国主权，任意践踏国际制度。摩根索一生都致力于说明以普世主义和道德主义界定美国国家利益的危险：“个人道德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一项基于个人道德原则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国家自杀的政策。”^⑤ 小布什时期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政策，最终导致众叛亲离，盟友及其追随者纷纷与其分道扬镳，这证明其所倡导的一套价值没有得到追随者的认同和分享意愿，这反而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侵蚀其霸权正当性，腐蚀其霸权基础。

① 张睿壮：《也谈美国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页。

② 查尔斯·库普乾著：《美国时代的终结》，第249页。

③ 查尔斯·库普乾著：《美国时代的终结》，第263页。

④ 潘亚玲：《美国国家利益观的演进》，《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第98页。

⑤ Hans J.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6), pp.113-115. 转引自潘亚玲：《美国国家利益观的演进》，《复旦美国问题研究》，第108页。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展与困境

——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

刘若楠*

内容提要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加以反思和综合而形成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在《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一书中，主要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探讨了国家的内在属性和特征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介入到领导人对外部威胁和机遇的评估中，从而影响他们可能采取的外交、军事和对外经济政策。这本书的研究系统阐述和评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国家如何评估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安全威胁以及如何进行应对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区别。

关键词 新古典现实主义 结构压力 国内因素 外交政策

1998年，吉登·罗斯（Gideon Rose）在《世界政治》杂志发表了一篇书评文章，最早提出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罗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评述了代表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路径的5本著作，其中包括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等学者的四本专著和布朗（Michael Brown）主编的一本文集。^①罗斯的文章既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开拓性成果，也为这一新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方向。在此后的10多年间，新古典现实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最具影响的理论分支，激发了大批学者的研究。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 Lobell）、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等人主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下文简称《文集》）一书，^②汇集了主要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最新研究，对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作了系统阐述和评估，集中展现了这一理论的最新进展。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兴起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强调国际结构作用的新现实主义相对，这一理论主张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国家内部结构如何对外在威胁和机遇进行过滤，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估威胁、制定战略、动员社会

*作者简介：刘若楠，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①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②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资源以支持这些战略，以建立一种解释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①

这一现实主义理论分支的兴起源于对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反思与综合，在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结构现实主义擅长于解释国际政治结果，但因其过于宏观和抽象而难以解释具体的国家行为，而古典现实主义忽视了国际体系的主要因果作用，与此同时不符合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使其难以适应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需要。

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抽象的和宏观的国际结构难以解释一国的具体行为。解释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当结构稳定时，国家采取某项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当不同国家对结构变化及其方向认同一致时，采取了不同外交政策的原因。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这种解释力不足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具有同质性，即不考虑除权力大小之外的其他因素；二是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黑箱”，即国家只对且能够对结构及其变化做出恰当回应。另外，对于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一方面肯定了其对各国国内情况的差异性和影响外交政策的诸多国内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认为由于古典现实主义产生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所以需要加入对国际体系作用的考察并且肯定其主导地位，此外还需要借助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别是在研究中引入可检验的假设。

鉴于既有现实主义理论存在的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应运而生。它通过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坚持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以及建立区别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因果逻辑提出了一个明确且有意义的研究纲领。首先，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外交政策，这就意味着所有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都被纳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视野。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比如国家中心论、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以及权力是维持国家生存的必需。^②最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借鉴了新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结构通过影响国内约束和精英认知等干预变量作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③

在对新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之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希望通过建立独立的研究纲领发扬二者的优点，弥补二者的不足。其基本思路是肯定国际结构对外交政策大方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国内因素的影响，结构信号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至决策者或者结构本身没有给出应如何回应的确切信号。因此，要理解外交政策，必须解释哪些国内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结构信号的传达和回应。

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的重点正是结构压力、国内因素和国家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承

^① 近来中国学者对这一理论发表了许多相关评介，可参见刘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前景》，《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155—168页；宋伟：《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25—47页；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27—137页；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134—150页。

^②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14.

^③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0.



认体系的首要因果作用的前提下，这一理论将单元层次因素重新带回到现实主义理论中，并且提升了其理论化程度。这种研究路径的转向符合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层次回落的发展趋势，可以视为一种进步的问题转化。^①

二、从《文集》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最新进展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一书除第一章导言和第十章结论部分涉及学理层面的探讨之外，其余各章大多是研究型论文，既有理论框架，也进行了案例研究。总体上看，这本文集从两个方面推进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首先，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主张加以提炼，明确了这一理论的研究范围，厘清了与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见表-1）。针对一些典型的批评意见，比如是存在简化主义倾向、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各位学者也作了回应和澄清。根据几位编者的阐述，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解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为何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二是面对相同外部压力的不同国家为何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这两个问题使其与结构现实主义区分开来，既不是对沃尔兹理论的重新表述，也不是在结构理论中掺杂单元层次变量来解释异常行为。^②在明确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议题被限定为威胁评估、政策调整以及资源汲取三类，分别涉及哪些国内政治因素确定一个国家处于威胁之中以及威胁程度大小，哪些因素在应对威胁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哪些因素影响政策的实际执行及其效果。

其次，将“国家”（state）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初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理论。将国家这个“黑箱”打开是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相近之处，但是如果有一种与之相区别的国家理论，就会与自由主义趋同，从而丧失理论的独立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立足于现实主义阵营之内，几位编者在导言部分阐述了一种不同的国家理论。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有着不同的地理范围、内部属性以及在无政府环境下共存和相互作用的能力。国家主要是一个安全研究的分析性概念，与民族、社会等概念具有严格的区分，可以被视为“国家安全执行者”的缩影，包括政府首脑以及对外安全决策的部长和官员。这些执行者处在国家和国际系统的结合处，从国家政治-军事部门获取信息，对体系的约束进行评估，并且确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从这一点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像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视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或经济阶层需求的简单集合，而是认为领导者在界定国家利益和执行外交政策过程

^① 这种研究层次的转变可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16—118 页；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第 134—150 页。

^② 有学者曾经批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只能解释结构现实主义的反常，这一批评参见，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 294-321.



中以对相对权力和他国意图的评估为基础，只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内约束。

表-1 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异同比较

研究纲领	认识论与方法论	体系观	单元观	因变量	基本因果逻辑
古典现实主义	归纳；关于政治本质的哲学反应或详细的历史分析	比较重要	异质	国家的外交政策	权力分布或利益分布→外交政策
新现实主义	演绎；定性与定量分析	非常重要；内在的竞争性和不确定性	同质	国际政治结果	相对权力分布（自变量）→国际结果（因变量）
新古典现实主义	演绎；定性	重要；无政府状态对决策的影响是变化的，有时是不明确的	异质	国家的外交政策	相对权力分布（自变量）→国内约束和精英认知（干预变量）→外交政策（因变量）

来源：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0.

由于本文集各章采用的具体理论框架、选取的案例以及研究过程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梳理这些研究，从而具体地理解这些研究如何推进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也可以明确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

第二、三章涉及威胁评估。洛贝尔重点关注了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对结构信号的接收和理解。作者指出因为物质实力分布和外交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完善的信息传递纽带，^①所以由此引伸出了三个问题，即国家如何评估威胁、评估过程涉及哪些国内因素、如果政治或社会的精英之间存在分歧将如何影响对威胁的评估。针对第一个问题，作者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威胁认定模型，认为国家对威胁的评估需要考虑来自体系的、地区的和国内的威胁，其中体系的和地区的威胁来自于大国，而国内威胁大多来自于可能反对现政权的民族或族群。除此之外，评估一国是否构成威胁依据的主要是内部某个部门实力的迅速增长，因为部门实力的增长会使另一国相关社会部门感到威胁。参与评估过程的主要国内要素是外交政策执行者以及认识到他国与自身相关的部门实力增长的社会精英，而且作者假定前者将促进国家安全状况和巩固政权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考虑，后者则重点关注增进自身利益以及压制

^①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44.



其他竞争性的社会力量。关于外交政策执行者与相关社会精英对威胁认定的问题，作者根据对威胁认定的一致程度划分了外交政策执行者可能面对的三种情形（几乎不受约束的情况、受部分约束的情况以及相对受约束的情况），并就每种情形分析了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随后的执行情况。

马克·布劳利（Mark R. Brawley）以“二战”之前法国、英国和苏联对德国威胁的评估以及各自的制衡行为为例，讨论了面对同样的威胁时，国家采取的不同制衡行为的原因。作者一方面将体系因素纳入到以国内因素为关注重点的传统研究中，另一方面将时间因素和国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融入均势理论，认为国家在采取制衡行为时必定要考虑这两个因素。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作者提供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二战”前制衡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威胁尚不明晰的情况下，法国竭力延缓德国经济复兴，推迟德国崛起的时间；英国希望德国经济恢复从而有能力支付赔款、制衡法国；苏联则是认识到可以利用德国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工业化进程。在德国威胁日益迫近的30年代，英法均加快了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脚步，英国加强了空军和海军的实力，法国修筑了马奇诺防线，苏联则通过与德国结盟争取扩充军备的时间。由此看来，“二战”前夕各国考虑在选择制衡行为时充分考虑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以及达到制衡能力所需要的时间。

第四至第六章分析了民族认同、领导人和国内利益集团等国内因素在国家战略调整和政策选择中的作用。珍妮弗·斯特林-福尔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以台海两岸的关系为例，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驳斥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认为经济往来的密切和共同利益的增多不一定能够促进和平，安全竞争的情况可能持续地存在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斯特林-福尔克的研究实际上融合了权力结构、身份认同和内部政治三种因素：国际结构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调，作者基于对两岸关系历史的梳理认为，海峡两岸的关系总体上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从建构主义的维度出发，作者首先分析了族群身份的形成包含了对内整合和对外区分两个方面，认为内部竞争和外部刺激会促进民族身份的形成，进而影响和重塑对外政策；就国内政治而言，作者论证了美国国内持不同对华政策意见的派别间的竞争，将这一因素作为强化两岸不同的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外部刺激。

柯林·杜埃克（Colin Dueck）着重讨论了领导人与其他国内政治要素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了对外军事干涉。作者认为虽然国际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外干涉的必然性，但是不足以解释实施某次具体军事干涉的原因和方式。因此，回答国内政治如何影响总统对外干涉的决定及其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者澄清了总统发动对外军事干涉并不是出于缓解国内矛盾的需要，而是需要考虑国家的安全利益以及国内因素的束缚，特别是由于总统和其他国内要素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如果总统要实施对外军事干涉必然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支持。随后，作者通过分析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论证在相对实力决定美国必然发动三次战争的情况下，国内因素是如何影响总统从而决定战争方式和进程的。这些国内因素包括了民意、



国会、利益集团、官员对威胁的感知以及党派之争。总体而言，文章指出了对外军事干涉的国内约束及其对领导人的影响，但恰是因为其试图涵盖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国内因素，所以没有明确哪些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了对外干涉行为的具体原因和方式，也就是没有突出核心的因果链条，这也可以从作者仓促设计的模型中略见一斑。因此，虽然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其中的所谓模型还是之后列举的三个案例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有力的回答。

里普斯曼试图回答国内因素在何种情况下影响对外安全政策以及哪些国内利益集团在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最为显著。作者认为因其对结构信号和自身执政地位更为敏感，对外安全政策的决策者是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国内政治中对安全政策影响力最大的是利益集团。首先在回顾新现实主义理论和国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主张进行了宏观的阐述。之后，在五个问题的引导下，得出了目标问题的具体回答，即在安全相对充裕的国际环境中以及在决策部门独立性强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利益集团能够发挥相对较大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往往体现在改变政策出台的时间、执行方式或力度上，一般情况下不能左右政策的推行与否；反之，利益集团发挥的作用较小。这是一篇以探讨纯理论为主的文章，作者试图找到利益集团发挥影响政策作用的一般规律。值得肯定的是，文章论述的结构比较清晰，而且与前面几章相比它避免了对案例的依附，即不是针对某个案例“量身定做”的理论或模型。但是，建立普遍理论的尝试一般难以避免得出常识性的结论，如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希望创建独立且有竞争力的外交政策理论，仅仅停留在类似本文的结论上似乎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第七、八章探讨了国家进行国内资源汲取和动员的能力。托利弗重点关注国家发展的问题，即在何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下国家能够成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或者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作者认为新现实主义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假定国家拥有无限制的国内动员能力。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制度、民族主义和反政府意识形态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各国的动员能力是不同的。通过观察，作者认为在外部威胁大、国家动员能力强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采取模仿的发展模式，反之如果国内动员能力差的情况下，国家往往模仿失败；在外部威胁小、国内动员能力强的情况下，国家易于开创新的发展模式，反之动员能力差的话，国家则既没有创新也没有模仿的动力和紧迫感。作者着重讨论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在政府动员国内资源时所起的作用。

施韦勒的研究延续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首先作者从观察现象出发认为国家并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一直在伺机扩张，而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国家的扩张行为越来越少。因为现代国家的民众广泛地参与了政治生活，所以扩张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之做出自我牺牲。这就需要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来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西斯主义，它源自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即悲观的、愤世



嫉俗的世界观。^①但是现实主义本身没有提供政策建议，企图扩张的现代国家就通过推行法西斯主义，描绘并使民众相信他们身处于一个极端危险的世界。

总体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对结构信号如何通过国内因素传导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了尝试性的回答，威胁评估和政策调整这两类文章反应了结构信号的两种间接作用。几位作者通过提出影响外交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以及说明它们的影响机制，力图完善和拓展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型。许多作者通过列举一个或者几个具体案例，指出单单考虑结构不足以解释某项外交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必须加入国内的某个或某几个干预变量才能够解释，其后论证案例中干预变量发挥作用的机制。对于国内变量的操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政策决策部门与社会是相对独立而又不是完全独立的，其它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所起到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独立于结构的。概括全书的研究，各位学者提到的影响结构压力作用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时间和能力、民族认同、精英的认知、利益集团、领导人的个人偏好等。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虽然《文集》中的每篇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推进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但是这些文章综合起来反映出这一理论存在着一些明显不足。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反映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不完善，而不是各位作者个人研究水平或理论素养的不足。笔者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导致新古典现实主义只是一个松散的阵营。从目前大量相关研究来看，包括《文集》中各章经验研究也突出的表明，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建立了太多的分析模型，而这些分析模型之间缺乏统一性。尽管这本文集力图形成一种与其他理论相区别的国家理论，以此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构建统一分析框架的基点，但仍然无法改变阵营内部缺乏凝聚力和整合性的缺陷。^②之所以存在这种困境，主要是因为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过于庞杂，不同的学者在变量选取上有个人的偏好，以至于领导人的认知、国家能力、意识形态等因素都被纳入进来。只有当阵营内部的各位学者使用统一的核心变量进行研究，或者至少明确他们使用的不同变量能够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中，新古典现实主义才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纲领。

第二，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因素对外交政策的主导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一观点充分地体现在文集中。由于每篇文章的核心案例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特殊性，作者往往为了将某个或某几个国内因素的作用充分展开，从而通过案例的选择控制住结构诱因。

^①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48.

^②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缺少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的批评也可参见，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第137页；Shiping Tang, “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4, 2009, p. 800.



这类文章采用将结构诱因与国内因素分离开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将国内因素的作用独立出来,突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内政治模型,但是将国际结构变量控制后就对其不加讨论,只专注于国内变量的操作使得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像是国内政治理论。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结构层次变量仅仅作为背景性因素来考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跨层次分析。^①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如何在案例中既突出结构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国内因素的具体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在处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上,文集的作者对此没有达成一致,模糊地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即结构和单元因素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洛贝尔强调了国家内部某个部门实力的增长是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承认了单元内的变化导致结构变化的可能性;而斯特林-福尔克讨论了中美结构性矛盾通过美国、大陆和台湾内部政治体系的“过滤”作用于三方的政策选择,相当于主张结构因素以影响单元内部政治的方式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尽管强调结构地位的优先性和单元因素的必要性,文集中体现的以上两点不足表明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没有明确结构和单元在其理论中的位置。只有很好地处理跨层次研究的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不足的弥补才能够名副其实,而不是仅停留在理想上。

第四,除了没能理清结构与单元的相对位置,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内因素模型的设计和国内因素的操作上尚不成熟。许多新古典学者往往通过具体案例发现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对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并就其影响的因果链条设计出一个所谓的模型,但是既没有对模型的适用范围作出相应的说明,有时甚至对模型本身的解释也不够充分。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模型难以应用于除作者提供的案例之外的情境,即便可以应用也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缺陷。采取这种就事论事的解释方式使现阶段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将体系与单元层次糅合起来的视角,难以称之为具备独立研究纲领的理论。对于一个理论流派的建立和完善来说,不仅需要有明确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且需要划定适用范围,使其在该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依附案例而存在。在对国内因素的操作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论述某个具体国内要素时难以做到排除其他要素的影响。政府的国内动员能力在与某种激进意识形态相关的同时,可能也与领导人的手段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突出某个国内因素的影响机制,但难以对其程度和范围进行进一步地衡量。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需要深入挖掘某个具体国内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不能停留在表面的论述,另一方面要理清其与其它因素之间的位置关系。

总体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严密性上还有待提高,只有真正厘清体系因素与单元层次之间的关系,并且阐明这两个因素在具体案例中发生变化时的作用方向,才能称得上是一种逻辑严谨的跨层次理论。

^① 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第137页。



四、结语

《文集》汇集了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中一批主要学者的研究，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探讨了国家的内在属性和特征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介入到领导人对外部威胁和机遇的评估中，从而影响他们可能采取的外交、军事和对外经济政策。尽管书中各位学者研究的具体案例各不相同，而且也试图提出不同的研究框架来加以解释，但仍然力图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确立为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研究纲领。作为第一部系统阐述和评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的著作，此书的出版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国家如何评估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安全威胁以及如何进行应对的理解，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区别。

目前，国内学界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多有评介，但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学者还没有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经验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将其付诸经验检验。理论只有与经验结合才能证明其解释力，也必须与经验结合才能推动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文集》中的多篇论文展现了如何将新古典现实主义运用于国际关系现实案例中，或许可以为中国学者今后的经验研究提供范本，利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



国际政治的等级状态? ——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高婉妮*

内容提要 在当代国际体系中,虽然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存在,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却也不像“无政府”假设所描述的那般缺乏秩序。通过质疑国际“无政府”假设,大卫·莱克提出在国际体系中存在着某种“关系型”的权威,主导国与附属国之间形成某种程度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程度的高低与主导国享有的“关系型权威”的大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以此试图形成替代性的假设。然而,他提出的“国际等级制”仅限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模式,并没有对整个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构成挑战,因而,国际等级状态也仅等同于国家之间的等级状态。

关键词 关系型权威 国际等级制 无政府状态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性”假设,主流理论——不论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建立在对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假设的普遍认同之上。^①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主流的理论假说固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提供很大的帮助,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经验现象的复杂多变使得任何理论假说对现实世界的解释都存在着不充分和不完善,不能因为对某一理论的推崇而忽视现实当中的异例,也不能将其变为禁锢、遏制其他理论的藩篱——“无政府”假设也是如此。

在新近出版的《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②一书中,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科学教授大卫·莱克(David A. Lake)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对“无政府”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国家间存在着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关系型权威,这种权威关系折射出国际秩序的等级状态(international hierarchy)。他在主导国与附属国交往的频度、深度与国际等级制的程度之间建立了变量关系,试图“通过理解国际等级制的本质和实践,更好地解释国家秩序的模式并尊重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③。全书视角新颖,结构简洁明了,变量选择典型有力,理论论证严谨周密,对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现状及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者简介:高婉妮,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① 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不确定的情形下,国家追求权力甚至安全意味着零和冲突和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自由主义者认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国家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如何进行合作而非持续不断的冲突。而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者来说,国家的目标并非如前两者所认为的具有某种“规定性”,而是经由社会建构的、本质上不断变化的,有“善”有“恶”。它们都建立在对“无政府”假设的普遍认同之上,所不同的是,各派对于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各持己见。

②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一、问题的提出

乔治·布什离任美国总统已有一年有余，但其任内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却并没有随他而去——伊拉克人民脱离了萨达姆的“暴政”，但是并没有进入一个自由有序的社会，个人福利甚至越来越糟。^①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以反恐和建立自由民主为名绕过联合国发动“预防性战争”不仅没有带来稳定和秩序，反而在地区内造成了失控与混乱，一些西方学者因而对美国一向的“保护和为他国建立自由民主秩序”承诺的兑现度产生了怀疑，^②担心它破坏到美国的国际权威。然而问题是，国际体系不是一向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么？怎么会存在“国际权威”？“无政府”与“国际权威”之间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综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尽管米尔纳（Helen Milner）、温特（Alexander Wendt）等学者对无政府的内容及其含义提出了与现实主义相左的认识，但很少有人对“国际无政府”的假设提出根本质疑。当然，各个理论对于国际权威（或类国际权威）也或多或少有些论述。在霸权稳定论中，霸权国生产有益于所有国家或大多数国家的公共产品，促进国际经济的开放，维护国家间的和平；^③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强国通过提供一种国际秩序巩固自己超越他国的地位，在这个秩序里每个行为体都理解其他国家对其某种行为的期望、按照某种习惯或模式做出反应；^④类似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通过提出国际“组织秩序”的概念发展了一种霸权生产秩序的理论；^⑤另外，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将权威要素纳入他的“软实力”概念中，认为它的一些特性使人们想要追随领导国。^⑥这些理论都部分地认识到国际体系中霸权国或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非平等关系，暗示了国际体系中等级制的存在，但却很少直接明确地将权威概念与其在国际关系当中的实践联系起来。《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一书则以正面质疑国际关系的无政府假设、国家间究竟存不存在权威关系为起点，提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体系内所有关系都处于混乱无序中——体系内单元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等级制，国与国之间存在着非法律的-正式的“关系型权威”、国家主权可被不同统治者在不同的治理层面分割的假设，以主导国对附属国行为合法干预的数量多少作为权威高低的指标，在权威和国际等级制之间建立了正相关的变量关系，并以1950-2000年间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安全领域互动的数量作为检验，指出国家间存在着一定的等级关系，国际政治并不仅仅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由此，该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际政治是不是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有没有等级制的存在？

① 从国家的最终目的来看，其一切机构及行为是为国民福利的增多而服务的。

②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③ 参看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此书虽然没有详细说明权威的基础或它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但介绍了这一概念，将其重新定义为威望，与权力中的声誉等同。

④ Organski, A. F. K.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2nd ed, p. 354.

⑤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⑥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12.



二、国际等级制的理论架构

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体系、自然国家和自助世界的假设一直主导着人们的视域。然而，正如一幅图画，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收获，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通过结合多种路径和方法，莱克对国际等级制概念及其在国际关系中意义的论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视角，国家仍然会为抵御威胁加强自我防卫，大国关系仍然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政治，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无形的交换契约，一些国家靠大国庇护而减少自身的防御投入，大国也会因此而获得一些国际权威，建立国际秩序。这样一种等级关系，“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不同的、更加复杂的、全面的政治世界”^①。

（一）核心概念

为了论述等级制，莱克将其定义为国际权威的存在，从政治哲学和知识的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国际权威进行了集中论述。^②他首先比较了权威（authority）、权力（power）和威压（coercion）三个概念，指出作为权力的两种形式，权威和威压都可以使作用的对象服从自己的意愿行事^③，但在权力行使的机制方面存在着区别：威压是行为体 A 威胁或使用暴力使行为体 B 改变原来行动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 B 对 A 尽管可能迫于压力而顺从，但并不一定存在义务上的认同，当 A 威胁或使用暴力的能力下降时，B 将不再顺从，威压也告失败；而权威，则具有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行为体 A 对 B 具有命令的权利而行为体 B 对 A 的命令有顺从的义务，且双方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可以作理论上的区分，但威压是靠暴力实施而权威同样以武力作为后盾，因此在实践中两者很难辨别。其次，他将现代世界中的权威分为两种：“正式的-法律的权威”和“关系型权威”，前者中统治者 A 对被统治者 B 命令的能力和 B 顺从 A 统治的意愿都遵从于法律或官方的安排，^④后者中作为主导者的 A 和作为附属者的 B 之间存在着交换或讨价还价，A 向 B 提供有价值的政治秩序^⑤而 B 授予 A 为提供秩序而对自己行为进行必要限制的权利，即 A 对 B 拥有“合法干预”的权力。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不再像殖民地时期那样对他国进行正式的统治，因此权威的建立不是靠官方授予，而以更加隐蔽的社会契约型的方式呈现出来，存在权威关系的国家也不再是旧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是新型的主导

^①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6.

^② *Ibid.*, chapter 1.

^③ 即“权力”的作用，按照罗伯特·达尔的经典定义，“权力，即行为体 A 使 B 做一些 B 自己可能不会做的事情的能力”，参看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1957, p. 202.

^④ 这个看法根植于马克思·韦伯的《经济和社会》，参看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15-226。他将权威视为一个理性的、法律的概念，后被发展成国家法律学说。

^⑤ 政治秩序，被定义为“对个人、财产和承诺的保护”，是投资和其它经济行为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参见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国和附属国——这允许、甚至鼓励了国家间等级的存在。由此，国家间存在“关系型权威”成为书中的第一个假设。

（二）变量关系

书中核心概念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即用“关系型权威”涉及的双方——主导国与附属国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来定义国际等级制的高低，也就是说，权威作为自变量而等级制作为因变量，权威的大小决定了等级制的高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体现出一种正相关。^①

首先，要论述国家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就不得不对传统的关于主权不可分割的假设重做一番审视：“如果主权不可分割，国家（哪怕拥有少许主权）就谈不上附属于他国。它可能会受其影响，但不会处其权威之下。”^②主权原则，自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建立以来，通常被认为具有三个要素：第一，在一国范围内，主权对其国民和领土具有绝对的权威^③；第二，主权排除外部因素对其所辖国民和领土拥有权威；第三，主权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在多个权威间被分解、共享或分割，即在任何政治共同体内，都只能有一个单独的主权或终极权威。由于前两个要素的存在，主权不可分割的假设意味着权威必须在国家层面上凝成一点，这点定义了国家。然而，在国际层面，按照格劳秀斯的认识，“不平等条约会导致主权的分裂，使条约缔结方中的强国受惠”。^④在国内层面，则存在着公共和私人领域之分，公共领域有正式的法律的权威而私人领域有通过私下协商形成社会契约所建立的私人权威。同样，正如国内存在许多私人权威，国际体系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主权国家对其他国家拥有部分的权威，从半主权国家到依附国、保护国、受封国、行省、自治殖民地及不完善联盟成员，主导国对附属国权威的行使不仅涵盖其国内政策，同时也包括一些对外事务，因此，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主权都很容易受到分割，这是书中的第二个假设。

其次，权威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体。A 对 B 拥有权威，并不意味着 A 对 B 的所有行动都拥有合法干预权，它能干预的或许仅是 1-5 的事务，而不包括 6-n ($n > 6$)；当然，这些受 A 干预的行动数量会发生变化，当其变化的时候，权威的大小及等级制的高低也随之变化。所有政治相互作用的领域都有公共和私人之分，主权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分割，等级制便是这种不断变化着的主权的对应物。不受政治权威干预的私人行动越多，等级制的程度越低；反过来，受政治权威合法控制的政策领域越多，等级制的程度越高。由此，等级制是个连续的变量，它以 A 对 B 合法干预而 B 服从 A 干预的行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当这些行为的数量少到极致时，A 便失去了对 B 的权威，两者间不存在等级关系，若所有

^①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2.

^② *Ibid.*, p. 46.

^③ 绝对的权威并不意味着整体的或完全的权威（从现象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最后的、终极的权威。关于这点，可参看 Chris Brown, Nardin Terry, and Rengger Nichola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litical Thought: Texts from the Ancient Greek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73.

^④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48.

国家之间均为如此，国际体系便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当 A 对 B 的合法干预接近于所有行动时，B 缺乏独立决策的权利或自治的能力，A 与 B 之间则处于完全的或纯粹的等级关系，比如帝国对附属国大部分的经济和安全事务插手。

以国际权威定义等级制之后，莱克以对国家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等级关系为两个维度，具体说明国际等级制的变化。他从无政府出发，将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从低到高依次列为无政府、外交、势力范围和保护，将经济领域的等级关系从低到高列为无政府、市场交换、经济区、依附，说明在两个极端（无政府和保护）之间，随着主导国对附属国影响范围的变化，两者间的等级形态也不尽相同。（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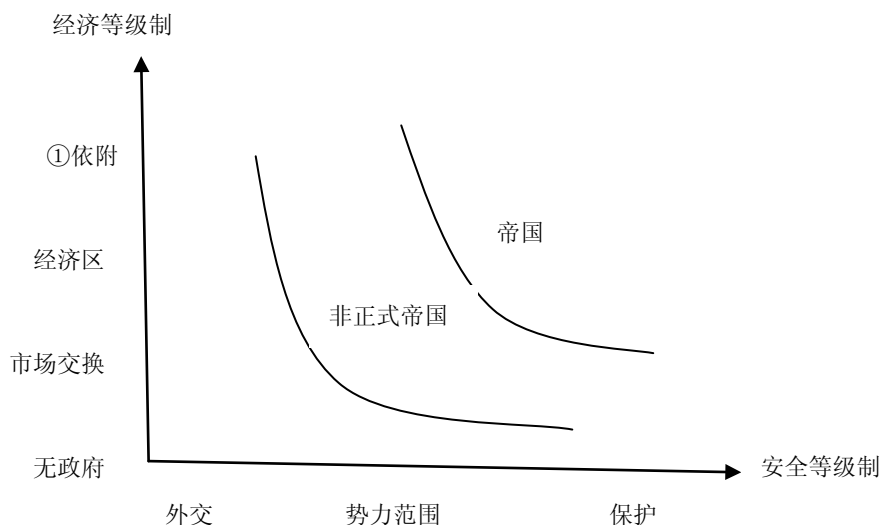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等级制的维度

在无政府关系中，相互作用的政体对各自行为拥有完全的权威；在安全保护和经济依附的关系中，政体 B 放弃自己的权威而让另一方 A 拥有，即帝国的存在。这两种情形在现实当中都极为少见，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部分权威转让的“非正式帝国”^①形式，A 可能会仅限制 B 与他方的合作，或对 B 的外交和防御政策施加压力进行“弱保护”，但没有对 B 的所有行为拥有合法控制权。

通过两个主要假设和一个变量关系，作者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由关系型权威定义的国际等级制随主导国对附属国合法干预行为数量的变化而变化，附属国受主导国合法干预的行为越广泛，其与主导国之间的等级关系越明显，国际等级程度越高；反之，附属国受主导国合法干预的行为越少，两者间的等级程度越低。

（三）理论检验

理论假说若没有历史检验和验证，其效用就会大打折扣。莱克用三章的内容对其提出的

^① 面对主导国威胁的可能，趋附它可以获得安全；面对第三方的威胁，依赖主导国的庇护可以吓阻。



国际等级制模式进行了案例检验，其中一章为二战之后美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等级模式，另外两章则分别从主导国、附属国的角度探讨了等级制为其带来的成本与收益。^①首先，从自变量出发，莱克从1950-2000年间美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中抽取了两组衡量等级制的操作化指标（安全、经济），包括：安全方面，（1）主导国 A 在附属国 B 领土上部署的军事力量的多少，（2）B 拥有的独立联盟的数量；经济方面，（1）以汇率制度定义的 B 的货币政策的自主权，（2）A、B 之间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主要为 B 对 A 的经济依赖度）。这些经验性指标的设置，将主导国对附属国的权威与单纯的威压区别开来，指出了等级关系的核心是权威和“合法的威压”。通过这些指标的考察，可以看出：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美国与拉美（尤其加勒比海沿岸国家）、西欧和东北亚的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程度不一的安全或经济上的等级关系，而与非洲、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国家则很少存在权威关系，几乎没有构成等级制——这验证了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着等级制，自变量主导国与附属国之间联系的松紧、权威的大小决定了因变量国际等级制的高低，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论点；同时证明了国际无政府和主权不可分割的假设并不完全可信。

关系型权威契约的核心是主导国为附属国提供政治秩序以换得附属国的服从，双方的共同需求是政治秩序^②。在案例检验的过程中，莱克主要以美国为模型，分别对主导国、附属国在同一政治秩序中的收益和成本作了专门分析（参见表-1）：

表-1 等级关系中双方的收益与成本

	收益	成本
主导国	免受附属国对自己安全的挑战与威胁	保证附属国的生存和领土完整，限制第三方对其威压的企图
	建立有益于自己的国际秩序	创造和巩固规则，提供公共产品
	从附属国处获得针对第三方行动的合法权	“自缚双手”遵守规则； 惩罚背叛行为
附属国	减少自我防御的成本	服从主导国命令，放弃部分自主权
	享受与主导国贸易的优惠条件及附属国之间的贸易开放	在主导国参与的战争中与其结盟，进入战争
	在与第三方的冲突中获得主导国的保护	放弃与主导国不和的第三方结盟； 接受惩罚

在1950-200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经历了与苏联的冷战和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两种局面，莱克通过分析基于变量的几个操作化指标在当时历史阶段的表现，检验了它在当代世界中所拥有的广泛的关系型权威，又通过比较等级制中主导国与附属国各自的边际成

①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s. 3-5.

② 政治秩序的基本内容包含：人身不受暴力伤害的安全、财产不受挑战的保证以及对已有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的期望。参见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94.



本与收益，检验了它们对等级的原始偏好。由此，国际等级制的核心论点得到了历史案例的检验。

三、莱克分析的局限

莱克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国际等级制的模式，明确了它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存在，推导了其中的国家行为的含义，并且对这些假设进行了经验验证。他提出的这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路径，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从理论假设的严谨度与经验验证的周密性来看，《国际关系的等级制》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第一，莱克自己也承认，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国际等级制的理论”。^①首先，等级制的提出是以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假设寻找替代性假设为出发点的，从这点上来看，“等级制”当是对应于“无政府”的一种体系的假设，即国际关系处于“等级状态”，莱克的理论也应当是一种代替现有理论对国际关系解释的宏理论。然而，在书中，它仅仅局限于主导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双重关系，认为在体系内单元之间的排列上存在着一国权威凌驾于他国之上的情况，“无政府状态”只是国家之间权威关系趋近于零时的极端例子，现实当中并不太可能出现。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之内，而并没有涉及到体系本身。从这点上看，莱克在不自觉之中缩小了理论解释的对象。

其次，莱克对“无政府”假设的挑战包含着对“自然国家自助”命题的否定，附属国会自愿放弃部分主权换取主导国在安全上的庇护从而减少自我防御的投入，去发展经济或增加国民福利，因而推翻了传统理论中国家追求安全最大化、尽量增强自我防御能力的论点。然而，附属国自愿放弃部分主权，甘心受他国领导的最终目的却依然是获得自身安全，免受外部威胁——不论是来自主导国还是第三方，^②而主导国对附属国的义务之一也是确保其不受第三方的威胁，使其得以生存。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国家依然是寻求安全确保生存的，也依然靠的是“自助”，只是手段更加灵活而已，莱克对“自然国家自助”的挑战建立于“自然国家自助”的假设之上，无异于“骑马找驴”。因此，从理论建构的本身来看，莱克没有实现为“国际无政府”寻找替代性假设的抱负，而依然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设，降低了理论建构的层次。

另外，在概念定义上，他将等级制表示成主导国与附属国间的“关系型权威”，以“权威”来说明“等级”，却并没有对“等级制”本身给出独立的定义，对其属性缺乏系统论述；况且，寻找到的自变量“权威”是一个“关系型”概念，缺乏标准而难以客观衡量，使整个等级制理论的建构缺了“着地”的支点，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第二，在理论验证的过程中，案例的选择过于狭隘，测量指标不够客观。一个理论固然不可能对所有案例都具有完美的、无懈可击的解释力，然而，它之所以成为理论，其属性之

^①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face, p. 2.

^② 面对主导国威胁的可能，趋附它可以获得安全；面对第三方的威胁，依赖主导国的庇护可以吓阻。



一便是对某种现象或一系列行为形成系统的、规律性的解释。莱克在书中把等级制的检验对象仅限于1950-2000年间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关系，排除了美国在其它历史时期的对外关系，其他政治行为体在1950-2000年间的对外关系，以及其他行为体在其他历史时期的相互交往模式，案例的选择过于单一，理论解释的广度遭到遏制。

除了整个案例的选择有缺陷之外，莱克对于衡量等级制程度高低的指标设置也存在问题。不可否认，安全和经济是当代国家相互交往的主要领域，选取这两个领域作为衡量国际等级制的指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然而，在具体的操作化过程中，人们却很难从一国在他国领土上驻军的数量及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来辨别出二者间是不是主导与附属的关系，或许是一国威压另一国呢？又或许两国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呢？而且，我们也很难从一国汇率政策的变化中看到该国影响力的大小，这本身是个充满了主观色彩的判断，用它做衡量等级制的一个标准，其效用必定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莱克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理论建构的层次不够明晰。他试图将等级制作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替代性假设来提出，却在论述过程中不自觉地将其从国际体系层面降低到国家层面，降低了理论层次；第二，检验案例的选择过于单一。他仅将等级制的检验置于1950-2000年间美国的对外关系的案例之下，使得整个理论的适用范围片面而狭窄，其解释力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议题进行深化：国家间的等级关系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等级制本身存不存在一种机制上的安排？扩大案例范围，将其他政治行为体（如欧盟、国际托管地等）纳入等级制检验的范畴后，国际权威的模式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在操作化过程中，能不能找到更加实际、客观的指标？中国在“美国的国际权威”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习惯性拒绝的同时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聚焦 2010 年核安全峰会

【编者按】

2010年4月12日至13日，首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此次峰会共有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47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是美国自1945年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峰会。在核安全峰会的全体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加强核安全和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等议题进行广泛讨论。会议以发表公报的形式阐明共识，呼吁与会各国及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争取在4年内确保所有易流失核材料的安全。会议还决定，将于2012年在韩国举行下一届核安全峰会。此次峰会因其重要性而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聚焦，引发了政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本期“青梅煮酒”就以此次安全峰会为题，摘录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媒体声音，并展示南开国关学子的独到评论。

奥巴马外交品牌的本质

4月12日至1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深刻地反映出美国总统的治理模式。虽然评估这次峰会的具体成果还为时过早，但峰会中所透露的奥氏风格却值得世界探究。以下是NSS提取的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本质：

1、美国例外论——奥氏风格。预防核恐怖主义从未像现在这么紧迫和需要国际合作，美国领导权对于激励与促成协同行动至关重要。虽然前任总统小布什已经采取了值得赞扬的措施来认识和考虑这种威胁，不过奥巴马却成功的使其成为国际会议的关键议题。同时，各国领导意识到隐藏于本次峰会中的美国意图，并对此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2、并非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零和博弈。奥巴马因过度强调国家间共同利益而饱受指责，但在核安全方面，对于多数利益相关者来说最终结果并非零和。此次核安全峰会既有利于预防核扩散，也促进了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

3、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国际体系。奥巴马认为扩大的对话机制是取得变革性成果的关键。因此，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合作中，其更倾向于将八国峰会扩展为二十国峰会，以及本次核安全领域的四十七国峰会。另一方面，奥巴马强调国家平等，并给予小国同等尊重。本次峰会中，奥巴马致力于将核安全领域纷争不断的小国拉入国际体系。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约旦，哈萨克斯坦这些都是关键的参与者，为什么不在最大程度上把它们也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呢？

4、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涉及尊重。奥巴马因不像小布什那样与德国的默克尔、俄罗斯的普京还有英国的布朗保持亲密关系而受到批评。或许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些友好关系并不能阻止未来几十年中跨大西洋关系的非常明显的裂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布什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假定的地位是直接的强势，而非协商。奥巴马已经明确地表示协商解决问题，这在传统的媒体报道外国政策的二元方式中，理所当然的显现弱势。以奥巴马的观点来看，协商是战略性的并且是符合其目标的。平等地对待各国并巧妙地将义务加于他们，这有利于领导人处理国际事务。第一年，奥巴马是耀眼的政坛新星，但不被看作是重量级的人物，甚至一些盟国也如此认为。第二年就不同了，他在遗留问题上的强硬观点（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中东和平），使世界知道他的立场。他已经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其作为世界领袖的身份正日益明显。

5、本质的延续性。不断演进的世界形势，使得判断国家外交策略越发困难，正如奥巴马的中东政策让人捉摸不透。对于伊朗，奥巴马正试图修正其坚持国家平等的理念，尽管奥巴马声称尊重伊朗人民的主权独立性，但行动中仍不断干涉伊朗国内事务。奥巴马能否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将会是评判其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可能进行严厉制裁已为时过晚，尽管如此，从奥巴马政府的立场出发，制裁本身比如何制裁更为重要。伊朗希望得到尊重，并且和中国及俄罗斯签署了一些协议，但在某些方面伊朗是孤立的。奥巴马已经成功地找到了使中俄相信制裁也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途径：引用国际框架的《核不扩散条约》。

——编译自《大西洋季刊》

美国核武能力依旧强大 传递与峰会不一致信息

就在奥巴马总统与全球他国领导人讨论防核扩散问题时，美国政府似乎却正向外界传递与此次核峰会主题不一致的信息：美国的核武器力量依旧和以前一样强大。国防部长盖茨及国务卿希拉里也接见他国领导人，并向其重申了美国的军事力量。盖茨与希拉里还称，美国今年将花 50 亿美元实现核武器现代化，并表示美国将在遭到生化武器及核武器攻击时将使用这些核武器。《华盛顿邮报》援引希拉里对美国“ABC”电视台的话说：“我们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对于此次核峰会来说，美国的表现的确让外界感到意外，另外，核峰会将考验奥巴马总统的外交能力。

——编译自《华盛顿邮报》

喜看核峰会的“核心”突破

首届核安全峰会日前落幕，取得多项突破。长期以来，谈到核恐怖威胁，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美国人的事情”。事实上，现在已没有一个大国能确保自身具有核恐怖威胁免疫力。中国更无法做一个旁观者。会议表明，中国不再是反核恐怖的看客。

——新加坡《联合早报》

核峰会奥巴马系列肢体语言盘点 皆颇有深意

组图一：



- 法国总统萨科齐的身高已多次成为媒体揶揄的对象，这给奥巴马提供了男士拥抱的完美机会。可以看到，他将一只手搭在了萨科齐的肩膀上。
- 面对迷人的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奥巴马给出了一个大的拥抱。合影时，他用手搂住了她的肩膀。
- 同样是握手，奥巴马似乎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格外热情。

组图二：



- 与巴西总统卢拉拥抱的时候，奥巴马似乎在安慰他，或许他想起了巴西近来爆发的猛烈洪水。
- 欢迎韩国总统李明博时的场景颇为有趣。这位韩国领导人紧紧抓住了奥巴马的臂膀，而奥巴马则轻轻拍着前者的后背。
- 尽管有“铁娘子”之称，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很愿意与奥巴马亲密贴面的。

组图三：



- 紧紧地握手，并面向镜头露齿微笑。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奥巴马似乎想明确地告诉记者，我们很高兴见到对方。
- 与意大利人见面时，当然要辅以适当的手势。这一点，奥巴马在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会面时演绎得恰到好处。
- 在与印度总理辛格会晤时，奥巴马看起来表情严肃，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组图四：



- 由于身高差距太大，面对菲律宾女总统阿罗约，奥巴马选择了握手的方式以示尊重。
- 与南非总统祖马合影的时候，奥巴马温和地将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背后。

——编译自英国《每日电讯报》



煮酒：核安全峰会

江育恒：作为核能发展大国，中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参与核安全峰会，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为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维护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孙绶志：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有必要保持自身核威慑的神秘性，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

朱俊帅：削减核武库，防止核扩散，发展核能源，确保核安全。

唐宇：维护和平，控制核武。

陈超：核安全峰会注定是一场政治秀，该研发核武的还会继续，唯一带来的就是心理的安慰。

董柞壮：核安全峰会，美国掌握常规武器绝对优势，又企图保护美国不受核恐怖威胁，还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奥巴马可谓用心良苦。

陈宁：但愿这不是在反恐外衣下的核制裁。

陈鹭：核示范作用打动不了中国。

高学敏：坚决反对核恐怖主义！

汪佳：不要认为核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也在受到威胁，团结起来反对核武器，保卫我们的美好生活家园！

权贤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合作越发重要，恐怖主义拥有核武器将更大威胁全球安全，更需要国际联合。

黄星：核武器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要正确对待核武器，防止核武器扩散，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徐芳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陈晨：任重道远，前景迷离。

董晨：这可以算是当前混乱世界下的些许安慰么？

王雨辰：核不扩散，天经地义。要不安理会还分常任理事国呢。

温信赢：支持美帝。

崔亚乔：中国参加核峰会，中美数月争吵后初会，以会谈改善两国关系之意义，重于谈论伊朗核问题之成果。

徐诚：美国只许以色列放火，不许伊朗点灯，就看它们不顺眼，又奈何？

邱欢：落实向来是个问题…实质成果如何还需观望…

郎敏艳：美国与伊朗、朝鲜的死结打不开，重蹈撕毁“具有实质性意义公报”的覆辙只是时间问题。

谢路平：首先，会议达成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执行仍是疑问，目前既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也没有独立的国际机构来监管核武材料的扩散。另一个挑战是，将全世界目前数百座民用核反应堆高浓缩铀转换为低浓缩铀代价昂贵。此次的协议建立在各国不同程度的“核威胁”之上，关键取决于与会各国能否积极行动。目前思之只不过是看起来很美。

王鹏伟：收天下之兵器，聚之山姆，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其意何为？无核世界之虚，霸权秩序之实。

李绅：美国在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上如果也能这么积极就好了。

李金潼：当第一件核武器被打造出来的时候，就注定了它的生命轨迹：它将伴随世界人民长期存在！偶尔邀请一些心照不宣的



政治家，喝上几杯“核咖啡”（不同国家品种和级别还不同），一方面是“主人”借机推销“新产品”，占据更大话语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也是向民众渲染“领导地位”“依旧”，为自己身上贴金加分。但是，无论这次聚会上跳了多少支“交谊舞”，终究只会“人走茶凉”，深谙“江湖规矩”的各位大侠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零核理念”确实仅仅是“理念”！Obama 不过是在这次 party 上进行了一次相对体面的 good performance 而已。

石悠悠：美国的倡导下？这个已经从前提变成了默认规定了。

李红烨：核按钮是一个时间按钮，轻轻一按，2012 就来了，所以核安全值得提倡啊。

于洪宇：终于不是第二个哥本哈根……

金宵：美国慷慨激昂，亢奋，奥巴马拼死推进无核；中国不疼不痒，中庸，锦涛兄讲安全重合作；伊朗未被邀请，急了，内贾德纽约叫板美国。

裴植：大国把能毁灭世界十次的武器库存限制成只能毁灭世界八次，有意义么？其实中国也流氓，核捆绑战术实在是不上道，但是出于本国利益无可厚非。

殷茵：核材料，核武器本身并不直接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真正对和平构成威胁的是国家对自身安全和利益的界定。如果各国不能通过各种方式增进彼此的善意，那么和平永远只是纸上谈兵。

高蕾：美国实力减弱甘当召集人，各国不论意识形态只谈利益。

孙熙隆：尽管核安全峰会达成的成果“积极”，但能否得到执行仍存在疑问，关

键取决于与会国是否会积极行动。

刘鹏：在不威胁他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的前提下，和平利用核能是每个国家自有之权利，他国不应干涉；如超出此范围，各国应该承担起应尽之义务，为和平事业携手！

茅军芳：美国你别以为做出了一点承诺就可以对中国核政策横加指责，实际上美国的某些政策最为暧昧。

陈凯：首届核安全峰会只是看上去很美，信心不对称等诸多问题仍待解决。

李磊：核安全峰会有点核技术泄漏造成严重后果后再召集全球一起承担祸水的意味。

冯怱言：1.今天的伊朗，使人想起五十年前的中国；2.安拉说要有核武，于是伊朗就有了核武。

秦杉：我觉得各国缺乏共信是此峰会的一个大隐患。

梁哲：今年四月十二日到十三日，世界核安全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对于会议中的内容，我无心查看太多，主要看看中美两国的态度。表面上中美两国意见趋同，美国坚持“双轨”战略，中国也坚持“双轨”战略。然而在十三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我发现中美两国的“双轨”看似相同，其实大相径庭：美国的双轨，是关于两条道路的选择——或放弃发展核能源接受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或继续发展核能源等待一系列的制裁。这不是建议而是不同结果的声明，深层含义是，要么听我的，要么不听我的，后果不同你都要承担；中国的双轨，阐释为“通过外交手段，以对话和谈判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关于过程途径的建议，



也就是说，我有个办法，你用也好，不用也和我没多大关系了。这么看来，中国还是坚持了韬光养晦的传统。美国期望中国真的作为“负责任大国”，跟自己站在一起改造世界，改造“不舒服”的国家，然而中国自信心不足，没有挑起这份担子的意图。

世界各国关于中国是否支持美国制裁

四五月间，中东的伊朗、远东的朝鲜都有人访问中国，个人认为都和核安全相关，伊朗的代表可能是探口风，窥测中国是否支持美国对其进行制裁，如果伊朗裁核又会以何种方式援助伊朗；金正日则是把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看了一遍，不知作何想法。也许还会坚持走“核”路线吧，被南韩同胞冷对，拉走了中国的无偿援助，承诺为六方会谈营造有利环境。正所谓路漫漫而修远，吾辈上下求索啊。

中国的态度真是个有趣的谜团，一会如此，一会这般。背后显示的却是对担当责任的担忧，常有人引用霸权更替论或者领导权禅让之说论证中国从美国手中接过世界大旗的可能性，中国有这样的身体素质，可能还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我们开发西部，告诉非洲，发达国家就是你们的东部，只要自力更生，巧用外援，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展现东部，同最前沿的国家地区接轨。整个中国就如同一个永远难以平衡的世界，中国有能力领导自己，应该也有能力引导世界。可是美国甘当太上皇吗？它当太上皇，是摄政还是辅政呢？万一关键时刻撂挑子不干了，留下中国一个，岂不寂寞？对手可以成为伙伴，伙伴随时都是对手。中国与生具有的文化优越感还没能让世界以及自己相信

伊朗的疑问颇多，在之前4月1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过类似内容，某记者曾大搞文字游戏，指出中国以前的声明都是“对话”而这次却说“和平手段”，是否意味着同意美国的制裁手段。每逢这种问题，中国的发言人都打擦边球，一再申明中国的态度是支持“对话与谈判”的双轨战略，对于美国制裁手段则没有明确的可否。

它有创造世界未来的能力，更何况这种优越感还在物欲横飞的世界里艰难维系着。

就这次核安全峰会，还是取得建设性成果的，比如在防止核技术及资源向恐怖势力扩散方面，然而这又涉及中美两国对恐怖主义的不同判断。各执己见，总要争个高低，不知美国如何看待中国，中国总应该将美国视为亦师亦友。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利用的东西更多，习惯性拒绝的同时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肯尼斯·沃尔兹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1924年出生。1950年和1954年分别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1995年获哥本哈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教授，1971年起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终身名誉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美国政治学学会理事等职，并于1987—1988年度出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90年代曾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师生的欢迎。2004年曾在南开大学讲学，并被聘为南开大学名誉教授。

沃尔兹教授是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主要著作有《人，国家与战争》(1959)、《外交政策与民主政治》(1967)、《国际政治理论》(1979)、《核武器的扩散》(1995)和《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2008)等。其中《国际政治理论》奠定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石，为沃尔兹博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崇高的学术威望。

“非常幸运，沃尔兹不仅是个合格的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具备良好的文学基础、掌握大量资料储备的合格的国际关系专业学者。因此，他能够很好地分析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并且评价他们的思想对理解现实世界国际政治的意义。”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这是一位拥有着浑厚嗓音、慈祥外表与自信谈吐的老绅士，多重荣誉加身，却依然低调沉稳，朴实无华。出生于那个偏安于美国密歇根州东南角、据说拥有147个公园及密歇根大学的安阿伯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他从小对戏剧、英语语言技巧、数学、物理十分感兴趣。钟情于戏剧的他的求学经历也十分戏剧化。本科阶段刚开始时的专业是小时候的兴趣——数学，后来转专业学习经济学，原因和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考虑一样——数学似乎是一门不好找到未来事业方向的学科，而经济则能提供另一套从从政到经商的选择。但是，他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经济学，而是在文学



和政治哲学。通过母校奥比多林学院的恩师刘易斯夫妇给予的点拨和长时间的尝试，他最后选择了政治学作为研究方向。后来，他又选择国际政治作为自己的辅修专业，并以 1959 年出版的、以其博士论文《人、国家与国家系统——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为基础写成的第一本书《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而一鸣惊人。关于这本书，还有些颇为有趣的故事。

沃尔兹原本的专业是政治理论，加之之前的国际经济学习背景，他选择国际政治作为辅修专业。一开始，他找了哥伦比亚大学中专门指导将国际政治作为辅修专业的佩弗教授（Professor Peffer）作为自己的辅导老师。他和这个老师确定好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欧洲外交史，帝国主义等等；而他不感兴趣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则将不涉及。但是这个老师却在博士论文答辩前期病了，无法出席辅修学生的面试考试。于是，沃尔兹就去见了比尔·福克斯教授（Professor Bill Fox），并向他解释了自己的整个论文的架构安排，也就是《人、国家与国家系统——关于战争根源的理论》的基本架构。福克斯觉得这样的架构十分特别，于是他向院系秘书咨询了沃尔兹的相关信息。“佩弗教授确实时常帮辅修学生做出这样的论文架构”——这是福克斯教授发出的感慨。等沃尔兹再来见福克斯教授时，他对沃尔兹说，“如果你真的想研究国际政治，你就可以办到。”于是他最后选择了这个主题，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战争根源的三个概念：人的本性和行为、国家内部结构问题、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三者构成国际关系的完整意象。这就是他迈向创造理论的一个开始。而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沃尔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书。根据当时的规定，由于他的研究是受战争和平研究协会资助的，所以他这本书的大部分版税将归于该协会所有。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利害关系，因为起初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发行 1500 册都是一场赌博。但是，最终《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却发行了 100000 册，近乎畅销书水平。不得不说，这次沃尔兹亏大了。

作为老师的沃尔兹，同样经历丰富。从哥伦比亚、斯沃斯摩、布兰迪斯再到伯克利，沃尔兹用自己的智慧灌溉出另一批卓越的智慧，詹姆士·费伦（James Fearon）、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这些在现在也震耳发聩的名字，记录着这位大师的长者之风。他从不试图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思想，而是通过向学生示范自己的分析、实施的研究过程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与研究。他鼓励学生问出大问题，同时要有挑战正统权威的勇气，这其中当然包括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正是如此吧。

一个睿智的人与一段神奇的人生。也曾迷惘，也曾徘徊，千回百转之后，能够找到真正兴趣所在是种无比的幸福。如果你也同沃尔兹一般，对国际政治有着热忱，不妨听听他的忠言：What can you do? You can read, you can discuss, you can think. There's not much more you can do. Or you can become politically active. Yes, of course, you can become politically active.



文献资料搜索经验

刘丰*

一、原则

1、资料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学习与研究的需要，搜索、下载本身不是目的（当然有收藏爱好的除外）。

2、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数据库、馆际互借）。

3、把图书馆搬到自己的电脑里，方便做研究。

4、一定要亲手去找一找，不要等别人“喂”。

二、主要途径

1、国内外常用数据库账号密码

利用 Google 搜索账号密码，国内的包括 CNKI、万方；国外数据库包括 ProQuest、EBSCO、JSTOR、Project Muse、Sage、Cambridge、Wiley 等；即使不在学校，也能够使用到数据库。

在线论坛一般每天公布当天可用帐号汇总，需要逐个试验是否可用；由于短时登录和下载数过多，多数帐号发布不久便被停用，少数存活期较长。

2、搜索引擎：Google, Yahoo 等英文搜索

Google Scholar: <http://scholar.google.com/> 参见《浅谈用 Google Scholar 查找并获取外文文献的技巧和方法》；

Alta Vista: <http://www.altavista.com/> 一个相对比较学术的搜索引擎

One Look Dictionary: <http://www.onelook.com/> 词典搜索引擎

3、网上电子书

英文原版电子书链接网站: <http://gigapedia.org/>（高清晰 pdf 版本，一般有书签；电子书一般存放在 Rapidshare、iFile 等在线存储网站，下载方法可 Google）

中文电子书可登录国学数典查找: <http://bbs.gxsd.com.cn/>（一般是扫描 pdf 版本，现在也有部分从 rapidshare 等网站下载后的英文书）。常用的有：

谷歌图书 <http://books.google.cn/>

新浪共享资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

超星 可以用 pdf factory 把 pdg 文档转成 pdf 格式

人文小屋 <http://www.97renven.cn/forum/> 大量优秀英文原版书

Ebookee <http://www.ebookee.net/> bt 电子书下载

人大经济论坛 <http://www.pinggu.org/bbs/> 大量的经济学类原版书、译著、教材

4、课程网页

* 作者简介：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



经常查找国外相关课程网页，一些教授会将部分甚至所有阅读资料全都挂在上面；但由于版权意识，直接挂上去的较少。

例如：如果你对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感兴趣，你可以访问 UC Davis 的 Zeev Maoz 教授主页和他所教授的“Political Network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课程网页（<http://psfaculty.ucdavis.edu/zmaoz/courses.html/pol279-09.htm>），上面存放了该课程的所有阅读材料甚至研究数据，你可以直接下载。

5、E-reserves 等

有一些 nice 的老师会把密码贴在 syllabus 上

例如：Rice Uni 的 Brett Ashley Leeds 在 Fall 2009 所教授的一门课程“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她所使用的教材是 Frieden, Jeffrey A., David A. Lake, and Kenneth A. Schultz. 2010. *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然而，当时该书尚未出版，所以 Leeds 教授就将 Norton 授权给 Rice Uni 的在线阅读密码贴在了 syllabus 中：“Students in this class are authorized to read and print the textbook from the Norton website. The URL is: www.wwnorton.com/college/polisci/world_politics_ebook/ and the universal registration code is PHDL-FXXL. Upon your first visit, you will be asked to register and create your own password, which you can use to access the site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semester.”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访问该链接，下载打印这本最新的教材。

你可以通过 Google 搜索：

关键词+Electronic Reserves/E-reserves+password

比如：“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serves” password/pw

一般而言，本学期之前的阅读材料都会从 E-reserve 中移除。

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看当前学期（比如 Fall 2009）的课程大纲。

6、最新期刊

经常性地跟踪主要期刊的网站，随时随手更新；

阅读的主要期刊有：

主要刊物	次要刊物	政策性刊物
<i>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i>	<i>European Journal of Int. Relations</i>	<i>Foreign Affairs</i>
<i>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	<i>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i>	<i>Foreign Policy</i>
<i>International Security</i>	<i>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i>	<i>International Affairs</i>
<i>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i>	<i>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i>	<i>National Interest</i>
<i>World Politics</i>	<i>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	<i>Survival</i>
<i>Security Studies</i>	<i>International Relations</i>	<i>Washington Quarterly</i>
<i>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i>	<i>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i>	<i>World Policy Journal</i>



绝大部分期刊都可订阅 Email Alert，或订阅 RSS，第一时间接收；

建议申请一个专门的信箱接收期刊邮件。

7、学术会议

经常访问国外政治学会或者国际关系学会的网站，关注其举办的学术共同体会议。

例如，国际研究协会、美国政治学会每年都举行年会，提交给这些会议的论文可以在 <http://www.allacademic.com/> 免费下载。通常情况下，发表在主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都曾在一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宣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阅读到的最新期刊论文，其实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在这些会议上宣读了，这样你就可以跟踪某个领域的最新动态。

8、新书速递

经常浏览国外主要出版社网站，查看新书；

许多出版社一般可以预览 sample chapter(s)；

Princeton、Palgrave 一般提供导论或第一章，Oxford、Sage 有一章或两章，Cambridge 提供前 10 页。

主要的出版社有：

出版社	网址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cambridge.org/americ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up.com/us/
Palgrave Macmillan	http://www.palgrave.com/
Pearson	http://www.pearsonhighered.com/
Routledge	http://www.routledge.com/

三、电子资料的管理

文献分类以及借助软件管理很有必要。

大多数杂志或图书的出版社都会提供索引下载，“Download to Citation Manager”；一些软件还可以在线从国内外图书馆的联机目录数据库中查找和载入书目记录；

常用文献管理软件包括 NoteExpress、EndNote、ReferenceManager、Refworks 等；国产软件以 NoteExpress 最好，除可制作索引外，还可以载附件、做笔记等，具体使用方法可 Google。



老生常谈·飞跃重洋

申请出国经验总结

孙芳露*

我只是一个幸运的普通人，并不想在这里侃侃而谈我的“牛经验”，而是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和了解的信息与大家分享。南开政治学在国外念 Ph.D 的人并不多，在顶级牛校的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南开确实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学生，我很希望看到更多的南开人进入世界顶级学府，希望我的这点“经验”能够有助于后来人成功踏上这条漫漫的留学之路。可以说申请出国留学，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准备和注意的事项太多太多，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只列出应该特别注意的几项供大家参考。

个人背景：

南开国际关系本硕

本科：GPA 90/100 排名 1/39

硕士：GPA 93/100 排名 1/20

GRE：1340 TOEFL：101

论文：一篇非核心期刊；一篇英文国际会议论文

去向：Ric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D (Fellowship)

为什么要去留学？

这可能是很多人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问题，或许只是对国外生活的憧憬甚至是迷思导致的冲动罢了。留学是人生当中一个大的选择，自己应该慎之又慎。事实上，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只是怀着“出去了再说”的心情，我想，一个人把自己人生最黄金的时间浪费在糊里糊涂的留学路上是不值得的。而且，因为缺少目标，在申请的过程中，根本不知道应该把自己的材料投递到哪个学校，于是就出现了诸如“我要去看纽约”等等可笑的选校标准。准确说，我的留学念头开始在两年前（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只是一时兴起，觉得自己应该去国外看看，而且毫无准备，GRE 和 TOEFL 都没有考。从考 GRE/TOEFL 到选校到最后递出材料，我只花了不到 4 个月的时间。自己累得半死，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拿到的是一堆 Admission，没有一个 offer，唯一的一个奖学金 pending 也与之失之交臂）。那时候的我，甚至连自己出国念什么方向都没有想清楚，觉得做中美关系也不错，做比较政治也不错，这样的结局并不意外。在研一的一年期间，“我到底想干什么”是我想得最多的问题。在坚定了自己留学的信念之后，然后就选择是念 M.A. 还是 Ph.D. M.A. 录取比例高，但是基

* 作者简介：孙芳露，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8 级硕士研究生，现已被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政治学系录取。



本上没有奖学金。Ph.D 要求非常高，因而成功率极低，一旦被录取为 Ph.D candidate，基本上会给 TA/RA 来 cover 学费和生活费，fellowship 比较少见。建议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学生可以适当考虑 M.A.，如果在美国念完 M.A.，再申请 Ph.D，会很有优势。

前期准备：GRE/TOEFL；GPA；研究经历

去美国留学需要有计划地准备，这不是你想去就递个申请这么简单。首先是 GRE 和 TOEFL 的准备，如果英语根底不是很好的同学，建议尽早准备。用一句比较俗的话说，高的 G/T 不是万能的，但是低的 G/T 却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应该高度重视 G/T 成绩，但是并不建议一味地追求高的 G/T，毕竟这并不是决定能否申请成功的惟一因素。我的 G/T 成绩并不算高，但是我的外教主动给我写了一封英语水平的证明信，我想应该很有帮助。如果有这种背景的同学不妨可以这样试一试。对于 GPA 的高低，我的看法跟对 G/T 的看法一样，低绝对不行，但是高并不万能。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选课不只是为了修满学分，而且要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在申请的过程中，美国高校的政治学对数学的要求普遍比国内高，我申请的六个学校中，有好几个要求把与数学相关的课程成绩单独列出。如果在这方面太单薄是很吃亏的。再说研究经历，可能很多人把研究经历就定义为“有没有发表论文”、“有没有参与课题”，其实这有些片面。我曾经跟我的外教说中国把是否发表文章作为评定奖学金的标准。他非常惊讶，因为在美国很少有研究生能够发表论文，更别说本科生。之所以重视研究经历，并不是在意你过去的成就，而是为了考量一个人的研究能力。也有可能一篇毕业论文甚至一份小小的课程作业比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更能证明个人的研究潜力。重点在于你如何构思和实施这些研究？你的逻辑思维如何？你的各方面素养如何？因此，即使没有亮眼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有亮眼的研究能力。

研究方向的选择

只有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才有可能针对性地写申请材料和选校。政治学这一块儿，美国一般分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或者还包括方法论。如果以申请难度作为衡量标准的话，中国的国别政治、中美关系录取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毕竟我们是中国人，至少语言上是有优势的。但是，按理说应该来中国研究中国问题，而不应该跑到美国去研究中国问题。此外，还是回到之前的老问题——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美国的 Ph.D 至少耗时 5 年，而且一旦选择某个方向，几乎就定了自己一辈子的研究领域。若仅仅为了走出去，在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方向上耗上 5 年、10 年甚至一辈子，是否值得呢？我觉得应该综合申请难度、自己的兴趣以及优劣势来权衡取舍。这个问题，大学期间我没有搞明白。保研后第一次见我的导师，导师问我是否愿意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我的回答是“如果一年后我发现自己在某方面确实是适合的，我会考虑继续。”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研究，更何谈是否适合！研一期间，我不断地去反思自己。研一的时候每天要面对铺天盖地的阅读材料。我发



现自己特别不愿意去阅读晦涩的纯理论（对于我来说，是晦涩），而对于有图、有表、有模型的材料会更加感兴趣。再去反思以前的学习，高考的时候考得最好的是数学，本科期间只要涉及到计算的课程包括统计学、运筹、宏微经，自己的成绩都特别好，而且学起来非常轻松。国际关系领域能与计算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形式理论和定量分析。为了确定自己是否适合这个方向，我曾去经济学院旁听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课，这些经历反而让我的想法更加确定。

选校

在申请的过程中，选校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在选校的过程中，你要回答以下问题：该学校的研究特色或者老师的研究领域与你的申请方向是否匹配，你感兴趣的老师今年是否招收国际学生，该校奖学金是否充裕，等等。如果你把美国的学校从头到尾按照这样的标准挑选，估计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有两条捷径：1) 在看书、写论文、做研究的过程中，留意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老师，然后再去查他/她所在学校的背景；2) 多向别人咨询，不管是熟悉的还是素未相识的（当然，对别人的帮助要衷心地表示感谢）。美国院系的秘书一般都非常敬业，不管你问什么问题，他/她会很快给予答复，如果他/她不能回答，至少会告诉你谁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不建议鸡毛蒜皮的事就去联系国外的老师，这些院系秘书就可以解决。也不建议动不动就跟人说想念人家的博士（特别不建议群发邮件），他们给予回复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你言之有物。我的选校过程相对简单，放弃了地毯式的搜索，基本上就是前文提到的这两条捷径。就是这样，也差不多耗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推荐信

申请材料当中，其中有一项是推荐信。美国人对推荐信看得非常重，一封好的推荐信能让你加分不少。中国很多学生的推荐信都套用模板自己写，然后找老师签字——我不建议采用这种形式，毕竟我们不是老师，而且别人一看就会觉得毫无可信度。并不是说老师越有名气，推荐信的效力就越强，重点在于老师对你是否真正了解，老师对你的评价如何。如果推荐人与对方学校有联系，那是非常好的事情。一封推荐信不是从头到尾就应该是“好”、“非常好”、“特别好”等满含褒扬的词语。你得告诉人家为什么好。跟做研究一样，要有理有据有度。我的三位推荐人中，只有一位推荐人的推荐信草稿我见过。当我见到那封推荐信时，我特别惊讶。可以说，里面没有一个“好”字，但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老师把我写得非常出色，优秀得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老师里面举的例子也没有任何夸张或者捏造，确实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此外，一位外国授课老师的推荐信会很有力，因为他/她给出的评价会非常全面，包括你的语言能力、你是否适应美国式课堂、你的研究能力等等，这些正是别人想知道的。



保研历程浅谈

杨林*

在即将告别南开之际，能够借我们自己的刊物把保研的经历介绍一下，心中十分欣喜。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有益于立志保研的同学们。令我惶恐的是，这篇文章的受众可能将极为有限。因为自己选择的是专业硕士，所以谈及的重点也将主要在这一方向。对于立志于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同学，本文可能就没有多少借鉴意义了。

我国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开始逐步扩大专业型硕士的比例，而逐步缩小学术型硕士所占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的推免也开始划分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两种类型，而且专业型硕士所占的比重还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对本专业确实缺乏兴趣，专业硕士不妨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先谈一下自己的选择。当初自己是可以选择保送本专业的，但最后选择了专硕方向，这主要是兴趣使然吧。受自身理想等因素的影响，自己一开始就对本专业没有充分的兴趣。2009年4月，开始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专业。随后，买辅导书，上自习，报考研班，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6月份的时候，偶然获知法律硕士是接受推免生的，于是从那时开始关注保研。9月底，教育部新的推免政策出炉，随后咱们学院的保研名额也划分下来。我们这一届国政专业共有32人（不包括留学生），最后分到了三个保内名额，一个保外名额和一个专硕名额。随后的问题开始变得简单，因为自己申请的是专业硕士，没有人和我竞争，所以校内名额的获得相对容易。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咱们系推免名额分配的政策。通常，班里排名前十的同学有资格提出推免申请，随后系里会组织面试，最终决定名额的归属。一般来说，综合成绩评定时学分绩会占到80%左右的比重，其他的20%包括科研能力（论文、研究项目）和自己所获奖励等。

再说一下学校的申请。外校的申请关键是对信息的把握。应该密切关注自己心仪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网站，同时多去BBS上的Tuiyan版逛逛，里面经常会有最新的各大高校的接收推免生政策。外保的好处之一就是申请的学校不受限制，因此只要自己不排斥的名校就应该去申请，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胜算。有时，一些学校也会跑到南开来直接接收推免生，如去年人大、上海交大等就在南开单独组织过推免工作。同学们应该随时关注这些信息，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保送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当时只申请了这一所学校，最终，有惊无险，顺利通过了。很多同学之所以排斥专业硕士，与奖学金的分配有很多关系。根据教育部和很

* 作者简介：杨林，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06级本科生，现已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



多学校的政策，专业硕士是基本不享受奖学金待遇的，而过高的学费也使很多同学对其望而却步。我之所以选择政法，也是这个原因。在法律硕士培养方面，北大、人大、政法算是最突出的。而北大、清华和人大的法硕专业不仅学费昂贵，奖学金比例和金额也少得惊人。政法则不同，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享受同等待遇，奖学金的覆盖率达到 70%。我自己并没有名校情结，因此并不会汲汲于北大、清华这样的招牌。所以，对于那些认可法律硕士而对学费望而却步的同学来说，政法大学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你喜欢名校，或者有着足够的资本，那就尽情的申请这些名校吧，在参加推免面试时，南开大学的招牌会提供给你足够支持的。

最后，简单说一下政法的面试流程。在面试之前，学校通常会把面试的流程和考察的范围公布在网站上。政法的复试是相当繁琐的。10 月 10 号上午报到，下午接着就进行了笔试。笔试不涉及专业问题，主要考察逻辑和中文写作能力。我当时的题目是 8 个逻辑推理题和一篇写作题。逻辑题挺繁琐的，有两个到最后也没做出来。写作主要是给你一篇法院判决书，然后将其改写为一篇 800 字左右的记叙文。当时给我的是南京彭宇案的判决书，大约有两万字左右吧。10 月 11 号上午是英语听力考试，感觉特别别扭，至少一半没听明白。下午接着进行英语口语面试。四个人一组，先进行自我介绍，然后抽取一张图表，四个人就图表反映的内容展开讨论。12 号上午是专业课面试，分成四组进行，一组大约 20 人。我从上午八点开始，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进入考场。面试的题目是自己从 20 道题目中抽取，大多是法理和案例分析题目。我抽取的题目一个是庞德关于司法工作专业性的问题，一个是却伯关于法院和社会互动的问题。这对于学政治学的我们来说不算困难。13 号上午体检结束，面试工作也终于告一段落。17 号下午获知消息，顺利录取。这几个环节中我认为专业课面试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几个环节分差不会很大。必须承认，在面试时南开的名字会为自身增加很多的优势。

当然，说了这么多，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舍弃国际关系而选择专业硕士。我们南开国政有着一流的师资和完善的教学设计，相信这一切是不会让有志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同学失望的。无论最后大家如何选择，我们的身上都已刻上了南开国政的印记，这四年的求学生涯也必将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

最后，祝我们的系刊《新视界》越办越好，祝同学们梦想成真！



老生常谈·漫漫考研

我考研历程的一点体会

李沛*

一、引言

在今年的考研中,我考本校本专业失败了,但最终调剂到了华东师大国关院,也算有了归宿。在尘埃落定之后,回顾这段走过的考研之路,我感慨万分。提笔写下其间的点滴,对我为什么没有考上南开,为什么调剂上华东师大进行反思和总结,希望能对后来人有所启发。

二、我为什么没有考上南开

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是很必要的,同时对失败进行分析,得出教训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以英语小分差一分的成绩与南开的复试擦肩而过。这一分也宣告了我考南开的失败。这次失败也给了我深刻的教训:这看似不走运的差一分却带有很强的必然性。至少这几方面决定了我的失败:

一、心态摇摆。我虽然在 09 年 3 月份就确定考研,但是却一直摇摆着考外校还是考本校,直到 8 月份才确定考南开。也就是说我有近半年的时间在摇摆中度过,复习的效果那叫不堪回首。

二、盲目乐观。这是我考研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最终选择了考本校,有了主场作战的优势,因而在心态上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复习中也就放低了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复习的效果也就大大折扣。在此,我希望打算考本校的同学们,千万别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要杜绝盲目乐观的情绪,因为不论考本校还是考外校,其实都差不多,实力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

三、忽视英语。英语的一分成了我永远的痛,我对英语的感触最为深刻。其实这一分之差也充分反映了我复习过程中对英语的态度。由于对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上英语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所以我在复习的过程中,常常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它,选择了多看专业课和政治。最终的结果就是英语也选择了避开我。在此,我用我惨痛的教训呼吁后来之人:公共课特别是英语是我们考研中的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忽视和大意!

当然,我也不能说我考南开的过程彻头彻尾都是失败,考不好不能抹杀可取的地方。我觉得自身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善于寻求帮助。我在考研之中请教了老师、学长、同学。在专业课上,我通过请教刘丰老师,得到了很多学习方法上的启发。并且通过看刘老师推荐的《国际关系精要》、《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这两本书,理清了以前对国关理论的混乱理解。更

*作者简介:李沛,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现已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为重要的是我通过上刘老师给研究生开设的《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不仅看了很多外文文献，而且形成自己的一个理论知识体系。同时，我向很多学长以及同班学习优秀的同学请教了很多考研经验上的、知识上的、心态调整上的问题，他们的帮助对我启发极大，使我在复习中避免走了很多弯路。

三、我为什么能调剂上华东师大

调剂对于很多同学来讲也许还是比较陌生，谈谈调剂的经验也许十分必要。总结我的调剂过程，我觉得以下三点极其重要：

第一，要用心去调剂。在 2 月 25 日得知分数后，我的确痛苦了一番，但我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因为与其在痛苦中不干任何事，还不如放下痛苦把失败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我很快就一边找工作，一边着手准备调剂。为了争取时间尽早联系上院校，我在网上搜了很多信息，也给很多学校的招生办打过电话，但是很多学校都是直接拒绝了我。这是一个很痛苦也几乎看不到希望的过程，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而是更加积极的收集信息，同时也主动的寻找老师和学长们的帮助。在屡次的失败后，我终于得到了华东师大等院校需要调剂的答复。用心去做事才能成功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启发。

第二，寻找老师的帮助。我们系的老师们都是非常热心也很关心学生的，只要找了，老师们都很乐意帮助学生。我这次调剂能够成功离不开老师们的帮助。我在得知分数后就将情况告诉了吴志成老师、王翠文老师和刘丰老师，咨询了他们的意见。在我的分数最后没能进入南开的复试后，老师们在调剂中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吴老师给我提供了很多院校的调剂信息，这些信息，对我帮助极大。王老师和刘老师则给我写了推荐信，这两封推荐信对我的帮助也非同小可。

第三，寻求同学的帮助。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群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学长学姐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认识的同学远远比我多，信息量也非常大，加上他们对院校信息的了解比我懂得多，如果能够寻求这部分人的帮助，在调剂过程中就能够事半功倍。我在调剂中得到了陈永师兄的大力帮助，他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些院校调剂的信息，而且还告诉我很多调剂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我去华东师大参加复试的时候，推荐我认识了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研究生学姐。在复试准备的过程中，学姐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使我事半功倍。

四、总结和致谢

这次曲折的过程让我成熟很多，收获很多，我十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是他们的帮助使我在成熟的时节多了几分收获！同时我也要感谢《新视界》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将我的一些感触与大家分享！希望我的只言片语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的考研心得

宋珊*

考研是一个过程，一个蜕变的过程。从最初的彷徨到确定方向，从对未知的恐惧到坚强的面对，选择坚持，笑到最后，笑到灿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首先讲一下我是如何确定考研的吧。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大二大三的学生还是很迷茫的，往往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课程修的差不多了，开始面对考研还是工作这个令人头疼而且还想不出答案的问题。我想：“既然想不出答案，不如先实践，先尝试，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于是，我决定暑期不回家，选择留在天津找实习，尝试为以后工作做准备。我找过很多的实习，有一般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房地产经纪公司等等，最后我找到了三星经济研究院的一份实习。在那里，我觉得我以后就想要这样的生活，我也想成为众多优秀员工的一员。他们大都是海归，有着很好的教育背景，让我很钦佩。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了一点：至少在本科的起点上我没有输给他们！所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许就是“定位”！所以我也要给自己提出一个更高的定位要求。于是，我决定考研，希望能够继续深造，甚至出国。

有了这个想法，我考研的决心就已经很坚定了。我开始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准备报考北大的会计，结果在 09 年九月下旬才得知北大管院今年根本不招统考生。只好换方向了。于是，又一次陷入迷茫。目标突然一下子没有了的落空感让我难过了几天，但是考研的初衷没有变，恰巧发现复旦的这个项目还是合作项目，可以公费出国，于是我毅然决定继续走下去。在考研复习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很多困扰，而且觉得整个过程充满着未知数。考什么？怎么考？如何复习？没考上怎么办？要不要保研？脑子里面总会有很多的问题。考研教会了我一点：没有人会来指导你的路，你只有靠自己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光焦虑是没有作用的。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在看专业课的时候，我是多么地希望能有个老师或者同学帮我指导指导，但最终发现，大学和高中不同的就是“自立”，自己的问题得自己解决。一遍不会，一遍看不懂，再来第二遍第三遍直到会了为止。

很多人把考研等同于笔试，其实面试对我来讲可能意义更大。因为是跨校，又是英文面试。而且我自己有点不自信，所以很担心面试。我的面试经历了两次。第一次失败告终，很难过，可是没有选择，只有继续努力，吸取失败的教训，把第一次没有做到的工作做好。在第二轮面试的时候，因为准备的很充分，对自己就开始有了信心，就很顺利地通过了复试。

* 作者简介：宋珊，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现已考取复旦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这就是我的考研心路。其实每一个经历了考研的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段长长的故事，都会有份心灵的收获，有了一份成长。

最后，希望能给以后考研的学弟学妹一些复习思路的建议。我认为，我们专业的学生如果选择跨专业报考经济类或管理类研究生的话，对数学是要早做准备的。我是从大三开始把同济六版的高数、浙大的概率和清华的线代教材过一遍的，包括课后习题。只有在复习了基础内容了之后才可能去吸收陈文灯或者李永乐的复习全书的。不能上来就看复习全书。关于专业课的复习经验，我个人的复习方式是普遍撒网似地复习，虽然时间有限，但是全面看过提供的参考书目之后才可能结合历年真题来押题押重点。我的专业课书目都是全英的而且笔试也是全英的，压力很大，但是自己一边看一边给自己设定计划设定复习目标，尽力复习最多，结果还是可以的。专业课的复习，有一点很明显，你不可能把全部内容熟练掌握。心态一定要积极，争取发挥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专业课的复习不可以投机取巧，尽量多看。而英语和政治的应试成分则较多，我就不多说了。这就是我大体的复习思路。



老生常谈·职场点兵

从南开到南方

刘洋*

能到南开，或许是我高中三年努力学习的回报；可是，能进南方报业就不得不说有命运的眷顾……找工作历时四个月，所投简历过百份，但却只收到一个 offer，甚至也只进过一次正规的面试，此等窘境令我在接到南方电话的那一刻泪流满面。或许人生就是这样，好运厄运，谁都无法在当下断言。这似乎也决定了我无法总结出让人受用的经验，只能将唯一的麻雀解剖，以娱读者罢了。

南方报业每年 10 月或 11 月开始发布招聘信息（在应届生网等就业论坛均有链接，学校的 BBS 当然也会有相关消息），一般只接受官网的报名。在报名过程中，公司比较重视学校的类型，这一点南开是比较有优势的。报名时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相关实习经验和备注中自己想要说的话，公司会比较看重这两个方面，因为这体现报名的态度。简历筛选一般会去除 80% 的报名者，但南开的学生只要有一定相关实习经验几乎都能进入笔试，笔试名单会在特定日期在南方报业网公布。笔试一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进行，我们南开会就近归入北京考区，一般而言是在人大（这似乎是个惯例）。笔试一般分为三个题型：40 道逻辑选择题，与公务员考试相类似；20 道时事填空，一般是这一年国内外最突出的一些新闻；最后是写作：给出三个材料供选择，然后做一个主要内容概述，一个评论。

大概一周的时间以后，公司会通过邮件和电话通知一面的时间和地点。第一次面试在北京的西苑饭店，形式是群面，5-7 人一组。一般而言是给出一个新闻话题让面试者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是要保证自己的思路清晰，话不在多，到点即可；第二是要注意与伙伴互动，努力保持正确的态度，不要刻意参与到别人的“群殴”中，保持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所给话题。一面淘汰的人比较多，需要准备充分一些，一般而言可以在北大或清华的 BBS 上找到相关的面经，因为整个面试持续 5 天，如果被安排在后几天是比较有优势的。

一面后大概半个月才发出终面通知，依然通过邮件和电话告知面试的时间和地点。终面的形式是单面，一般 15 分钟左右，所谈的内容比较随意，有可能是学习生活，有可能是家庭，有可能是实习经历……但有几个点还是很特定的：对南方报业的看法，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以及面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性格。

这个过程似乎还是挺简单的，但确实令人煎熬。我觉得求职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态度吧，态度决定你是否关注招聘信息，决定你是否积极准备。另外，我推荐应届生 BBS 这个论坛，上面有很多笔经面经，也有很多求职者应时地分享信息。

笔钝语拙，言不及义，但愿来者有更好的表述吧！

* 作者简介：刘洋，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现已被南方报业集团录用。



求职的态度

周巨峰*

求职最重要的是态度。什么态度？夸张地说，就是“不尽快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睡不好觉”的那种态度。虽然有点好笑，但我想表达的是：求职一定要有求职的“诚意”，要实实在在地去努力。求职就像考研一样，心不诚，则难有作为。我们南开的学生，只要真心真意地要找一份工作，就没有不能找着的，而且不会太差。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

具备了这种态度之后，我们就会在确定找工作的那一刻起进入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会让我们主动地搜罗各种招聘信息，并精心准备我们的简历，认真准备每一场面试。招聘信息从何而来？起码应把握四条途径：1.学院信息。一般会通过班长通知下来。这是最有效、最方便的信息获取途径。2.学校就业信息网（南开首页右侧图标）。这是学校从繁杂的信息中精心为学生选取、采集的精华。它信息量大、可靠，每天都会有更新。从这里头好好选一选，总有一份工作适合你。另外，该网页上还有校园招聘日历，提供了各个用人单位来南开进行宣讲和招聘的时间、要求。3.学校 BBS 的 Job_post 版。里面也有很多招聘信息，以后上 BBS 除了看十大和贴图之外也多关注一下这个版面吧。4.“应届生”校园招聘网或“应届生 BBS”。如果有余力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个人觉得挺有用的。

好，我们把话题回到“态度”上来。在此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如果选择了考研并且真心想继续深造的话，则在准备考研期间就千万不要去找工作了。因为找工作是有“惯性”的，它会把你牵扯进去，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你会发现，每投出一份有效的简历，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会不止十倍于“投”这份简历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大部分的精力要投入到搜索信息并判断它们是否符合自己的意向这一过程中去。再者，要是简历真被对方看中，那更将进入一个漫长的面试、笔试的过程了（特别是年前那些摆谱的大公司）。对于准备考研的同学来说，就会考虑：到底要不要参加下一轮应聘呢？该不该认真准备下一轮应聘呢？于是又要纠结了，纠结的话又要浪费时间了。试问，这种状态怎能好好准备考研呢？所以说，不要以为自己在考研复习之余花点“闲工夫”找一下工作就“效用最大化”了。

反过来，如果我选择了找工作但又想考一下研行不行呢？那就随便啦，只要不影响找工作的“诚意”就行。考研就当是调节一下心情吧，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还有一种情况是，考研失利之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不论选择坚定地继续考研，还是选择马上去找工作，都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有一种态度

*作者简介：周巨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现已被录用为深圳市政府公务员。



是最不可取的。这种态度就是：先试着找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好的工作就继续考研。这样一来，因为给自己留了可以继续考研的后路，就对求职的事不上心。这就违反了求职的“诚意”原则。没有“诚意”则不会真心、努力地去找工作，从而无法使自己拥有一个求职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也就得不到（注意不是“找不到”）好工作。那种可以“继续考研”的心理暗示往往把自己真正领到“继续考研”的道路上来了。这不得不让人担忧：一个并没有坚定的继续考研决心的同学不得不再考一年了。想象一下，他会有多么不堪甚至痛苦，而来年考试的结果可能仍然无法使人满意。

所以说，求职的根本在于态度，而这种态度体现为一种“诚意”。不要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也不要迫不及待地学习求职“技巧”，或抱有某种侥幸的心理。先端正自己的态度：假若考研不坚定，还不如去求职；如果要求职，就要有“诚意”。方向性的东西把握住之后，其他的就好办了。至于具体的求职经验和方法，我们还有很多“达人”可以传授，我就不越俎代庖了。相信通过多次的实践和磨练，每一个求职者都会很快成熟起来。我记得有一个师妹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想找工作的都能找着的”——我深深信服这句话。



老生常谈·职场点兵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刘丹丹*

求职战线：从 2009 年 9 月初开始，一直到 2010 年 2 月初结束，长达 5 个月。申请了大概一百多家企业，有回音的大概是十多家。

- Offer：**
- 1、中国民生银行 天津分行
 - 2、中国银行 深圳分行
 - 3、深圳发展银行 深圳分行

最终去向：结合薪金、城市、压力、前景等综合因素选择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结束了我长长的求职旅程。

专业：国际政治（本科，没有双修或者辅修其他专业）

校园实践：自创社团（担任社团主席）；校团委组织部呆过，组团参加过校园营销大赛等

实习经历：新东方（天津区）；巴士德门业，香港嘉信（面试中起到作用的只有新东方的经历，可见名企是很重要的）

学习成绩：专业前十，拿过两次奖学金，一次优干，一次三好，四六级成绩中等，计算机二级通过。

从来没有想过去银行，却与银行结下缘分。一心向往快消，却是一一错过。这就是我奇怪的求职历程。

回想起过去的 5 个月，这其中有多少艰辛，有多少泪水，又有多少惊喜。

弯路：虽然很早就知道自己要找工作，但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样的行业工作。我定位快消，只是觉得它离我的生活很近，我可以感觉到。加上与欧莱雅义卖结缘，对快消印象确实不错。但是也许我真的错了，我并不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我也没有一流的英文水平。听的第一个宣讲是宝洁。宣讲是特能忽悠人的，让你觉得你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offer，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外企招的人很少，像非经济管理专业的那就少之又少了，所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宝洁。为了做好宝洁的八大问，我把自己大学生活好好回顾了一遍，还全部整理成文字，这些在后来的面试中，是非常有用的。接着，我一被高露洁、欧莱雅、联合利华三家鄙视，就是连简历关都没过。安利和强生给了笔试机会，安利因为笔试地点在武汉，放弃，强生笔试没通过。在被自己最想去的 6 家外企狠狠鄙视后的那个下午，

*作者简介：刘丹丹，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现已被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录用。



我难过到了极点。我突然觉得没有了方向。我想去的 6 家都不要我了，我以为世界上就只有这 6 棵树了，我茫然到了极点。那个下午，我狠狠地流下了泪水。痛过之后，我跌跌撞撞继续前进。

这期间也笔试了毕马威，没通过；面了衣恋时装，终面被鄙视（人家说我应聘的岗位直接不招人，郁闷）；面了融创地产，无缘无故的面了 5 次，最后无果而终；面了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终面被鄙视（与中山分行同来宣讲的，还有广州分行，但是当时没自信，简历都没投。现在想来真是不应该，那会老觉得自己专业和银行太不相关了，所以对银行没什么自信）；广州纺织集团，终面被鄙视；秦皇岛移动放弃笔试、河北移动放弃笔试；还面了一些自己都记不起名字的中小企业，虽然给了 offer，但是我没有把它们当做 offer，因为一开始就是拿来练笔的。

第一个 offer 是中国民生银行天津分行给的，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谢民生。在我几乎丧失求职信心的那一刻，至少他家给了我肯定。

面试经历：初面是很不情愿去的，因为觉得不是经济相关专业，去了也是当炮灰。当时室友很有心进银行，说是找到人一起拼车去面试。于是就跟去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通过了初面。二面是行长面。二面我就比较积极了，想着这么容易就通过了一面，看来进银行也不是不可能的啦。于是兴匆匆地去了。呵呵，这次面试更是神奇，行长直接说我面熟，问是不是在哪见过。哈哈，听到他这句话，我觉得自己机会大了。做完自我介绍，行长说我实践经历丰富，不知道学习成绩怎么样。呵呵，还好我成绩不错，专业前十。所以行长对我是相当满意了。走出面试的屋子，我觉得这个 offer 八九不离十了。两周后果然拿到了 offer。。

第二个 offer 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 offer。申请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完全是看着中行的网申太容易了，直接从中华英才的标准简历贴过去就行。很幸运地通过了简历关。中行笔试的题一级变态的，笔试时间也是超级长，差不多整整一下午。说实在的，那会真不想去笔试，觉得机会太渺茫了，中行深分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题目又那么难，一点自信都没有。但是想着，我们专业通过简历关不容易，就去参加了笔试。几乎都是蒙的，但是顺利通过了笔试，真是幸运。由于那时已经拿到民生银行的 offer，中行深分面试地点在北京，来去费用不小，我挺想放弃。面试的前一个晚上，我的两个好朋友都和我说民生太累不适合女生，另外一个男同学也说中行深分待遇很好，自然应该去试试。于是第二天去了北京。进了面试的宾馆，看到长长的面试名单，上面几乎都是名校的，专业也几乎都是经济管理类的。我虽然也是出生名校，但是专业实在太冷门了，那时真是没自信。加上一群一群的帅哥美女，我确实是汗颜了。群面的时候，我没有锋芒毕露，只是简单明了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几乎处于被忽视的局面。但是很幸运，面试官对我进行了单独提问，我自信一下子就回来了，很轻松圆满的回答了他的提问，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知道这次面试竟又是通过了。紧接着是二面。二面还是在北京那个宾馆，三对一的面试形式。自我介绍，提问等一一顺利通过，最后面试官纠结于我的专业不放。我就解释自己对金融行业是多么感兴趣，曾经也非常想学习金融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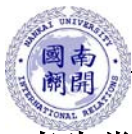
之类的话。面完之后，对结果完全不敢肯定。走出宾馆，我很慌。因为短暂的两次接触我已经喜欢上了中行深分。接下来是长长的 8 天等待。终于等来了中行深分的 offer。那一刻，我释然了，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第三个 offer 是深圳发展银行的。面试深发展的时候，中行的 offer 还没给。这次面试挺简单的，因为参加笔试的人很少。笔试几乎没刷人。面试的时候，因为有了几次银行面试经历，我自然也是信心满满。顺利通过一面二面。在他家给 offer 的时候，中行已经给 offer 了，所以自然选择了放弃。

总结我的求职经历，真的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啦。想去的地方全部把我鄙视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并没有把其他的机会全部否定掉，也一一进行了尝试。虽然这过程有消极的时候，但是毕竟我选择了坚持。弯路也不是白走的，毕竟他给了经验，当机会真正到来时，我可以就此抓住。

找工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被鄙视的过程，对冷门专业的文科生而言更是如此。这过程，你需要的是坚强的毅力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最后，我想说。我们国际政治的人很强大，因为有强烈的危机感，大家都很努力。我们认真地对待大学四年，所以我们是优秀的。有了这份从容，我相信我们专业的人都能打造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求职经验谈

黄诗颖*

作为一名即将离开校园的毕业生，借此机会，希望自己能够给各位即将踏入找工作大军的师弟师妹们讲讲一点个人的感想吧。在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奋斗，我是属于比较顺利也比较快的就找到与自己期望值相符合的工作。我最后签约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尽管与我大学所学专业并不对口，但是金融行业一直是我熟悉且希望从事的行业，银行业又属沿海发达的城市比较好。特别在银行实习期间，从各方面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说明找工作过程之前，我觉得自信是个关键。找工作是一个漫长而有不乏喜悦和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三分运气七分实力。很多时候就会苦闷着为什么投了简历而没有面试，为什么面了试又没有结果。我有些失败的时候就安慰自己说这只是运气和缘分的问题，不是我能力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只有对自己非常自信的人才能走出这种心情上的郁闷，继续勇往直前。所以当你有几次找工失败的时候，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而要鼓励自己，让自己恢复信心。

在我看来，找工作其实并不难，就像是一门课，只要你认真、用心去准备，特别是确定一个目标行业，付出了终究会有回报。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做出找工作这个决定是十分仓促的。在 2009 年 10 月中旬我才开始制作简历，开始正式投入找工作的大潮，相对其他做好充分准备的同学而言是比较仓促，因此也经历了刚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后来走上正轨的过程。10 月中旬到 11 月期间参加的各种校园宣讲会 and 招聘会，主要从南大就业网和 BBS 上得知，然后就根据要求进行网申。12 月底顺利得到第一个 offer，之后分别收到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等单位 offer，总共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十月份是投简历的最佳时间段，并在十一月开始进行面试，在十二月基本上已经开始能够拿到 offer。

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想要说，但是还是让我理出一个头绪来：

1、简历方面

所有单位招聘人才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筛选简历，过了这个环节之后你才拥有笔试、面试的环节。因此，简历是越直观越好，能够让人一眼识别你的学历、专业、学校，一般尽量限定在一页以内。简历中要强调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组织或参加过什么活动，作过什么项目，工作经历，个人评价。简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简历的内容要随着公司或职位的不同而不断修改，增加或者删除信息，投得多了你就自然知道那些 HR 们中意的简历的类型了。

HR 们停留在一份简历上的时间不超过 1 分钟，所以简历要简约但要包含很多个人信息和优势。现场投简历的时候（包括宣讲会和招聘会）都会有机会跟 HR 们面谈，HR 们就在简单面谈中对简历做记号，这也有可能是第一次的筛选。不过如何在几百份简历中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你跟公司的缘分和自己的运气了。此外，如果对外企感兴趣的同学，

*作者简介：黄诗颖，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现已被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录用。



最好提前准备好一份英文简历。

2、笔试方面

在你的简历足够精彩之后，你就进入了这个环节。很多公司的第一轮都是笔试，这个是考察你逻辑思维和判断分析能力，大多数的笔试内容没有专业知识，很多都是类似于考公务员的的试题，一般题量大，答题时间短，所以当你遇到不会答的时候就先跳过，如果后面还有时间再回过头来做，实在不会做的题目就蒙。有些单位在最后，还会给你一个作文题目，我认为这点就非常技巧了，你要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才能够在所有人当中脱颖而出。

3、面试方面

如果你能够进入这个环节，那么你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的人了。面试的技巧也非常重要，特别是需要十分的自信，相信你自己是最好的，也许你不是非常美丽，但是你有自己独到的一面，这点就能够让考官记住你了。在着装方面，一般要求穿正装。等待面试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只要公司没有给你拒绝的电话或者 email，你都不能灰心，特别是听到和你一起投简历的人都得到了面试机会，一定要平衡自己的心态，不要影响心情。

在面试前一般要做好充足准备：

(1)、练习熟一分钟自我介绍，了解一下公司情况，职位的情况。

(2)、心态要摆正。面试你的 HR 或主管和你是平等的，不要觉得他们位置高一点而显得自己处于弱势。越是这样越容易在面试的时候体现一种不自信。个人的感觉是，在面试过程中，气场越强，通常面试通过率越高。

(3)、说话要有底气。说话音量要适当，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但一定不能细声细气，这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说话的时候最好配合适当的肢体语言，要适当体现说话的艺术。

(4)、回答明确。头脑保持清醒，问什么就答什么，没有问的不要自己先说出来。可以看看网上很多面试的技巧或者面经，都可以知道面试官要问些什么问题。

(5)、注意礼貌和个人习惯。这些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就是进门打招呼，坐姿端正，不要抖脚，肢体语言不要过大，离开要说再见，要把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或者垃圾全部带出面试房间等。

4、offer 的选择

找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要么这个人一个工作都找不到，要么就是一个人找到了很多份工作。如果你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先不要着急，一定要赶快调整自己找工作的方法，看看自己欠缺在那里，比如说，是自信心不足呢，还是简历不好呢。对待简历一定要认真，特别是自己的联系方式一定不要写错。如果你成为了第二种人，那么你就面临选择工作的两难选择了。我的建议是不要问你周围的同学，因为他们也是和你一样迷茫，他们说的都是自己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感觉并不是十分准确。建议你问问你们辅导员，因为有很多毕业了的人还在和他们联络着，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单位具体怎么样，但是可以帮助你找一个原来毕业的人问问。或者你问问从事相关行业的哥哥姐姐，他们给你的建议都是他们亲自经历的事情，很有说服力。

南开大学的就业还是相当不错的，无论冷门热门专业，到了现在，周围同学找的工作都不错。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还是非常优秀的，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没有学到，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你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自信加努力，一定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



国际关系学系 2010 届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

姓名	年级	毕业去向
陈小鼎	博士	兰州大学任教
杨娜	博士	南开大学任教
孙芳露	硕士	出国留学
陈义萍	硕士	锦州银行天津分行
张萌	硕士	南开大学政府学院行政人员
孙吟溪	硕士	南开大学国际交流处行政人员
赵宇	硕士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行政人员
王晓旭	硕士	天津科技大学行政人员
吴宇	硕士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读博
宋丹阳	硕士	山东海信
刘洋	本科	南方都市报
周巨峰	本科	深圳市政府公务员
刘玉峰	本科	天津市科协选调公务员
柳俊桢	本科	泉州市选调生公务员
戴新琼	本科	西部计划
张飞扬	本科	中国移动
李涛涛	本科	浙江博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鹿献策	本科	南开大学读研
陈冲	本科	南开大学读研
袁婷	本科	南开大学读研
徐婕	本科	南开大学读研
宋珊	本科	复旦大学读研
杨林	本科	中国政法大学读研
李沛	本科	华东师范大学读研
张文超	本科	南京政治学院读研
刘思萍	本科	南京政治学院读研
刘丹丹	本科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黄诗颖	本科	中国工商银行福建分行
徐梦瑶	本科	百度天津服务中心
张靖	本科	锦州银行天津分行
张贝	本科	恒大地产财务
何维	本科	中公教育
岂宏晶	本科	蓝京科技
闫宇晓	本科	零点咨询
刘秀汀	本科	自主创业
何淑静	本科	自主创业

毕业生寄语

2010年，我们毕业了。

为梦想离开你们的门
那么不要犹豫
去飞翔吧!!
贝贝

青春是你我共同谱写的
歌曲,歌唱的是你
我生命中的奇迹和欣
遇,化成最美好的
回忆。
孙岩 姜子

柳阴下的匆匆告别,
同窗数载少年情长,
望征程千种思绪,
愿友情化为奋进的力量!
一张飞翔
国际双位

别后相思空一水
重来回首已三秋
刘洋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莫有南开走过的
脚印改 爱南开
06级国际政治
刘丹

勇敢做自己!
一定出奇迹!
Loring 国际
刘思奇

认真过好每一天!
孙志强

离别之际
定远望
南开
美好的回忆
长存心间
刘洋
刘洋

青春渐逝
远走他乡
从此
我们各安天涯。
陈冲
国际政治

You'll never
walk alone!
柳俊林

毕业不是梦想的终结
而是梦想的开始
大家一起不放弃
自己的梦想! 共勉!
孙志强

还未远走,却已想念!
希望童鞋们都有找
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人以及幸福的生活!
老范的

南开精神
永驻心田
周昆
06级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以此纪念四年南开岁月
李诗诗

毕业不是梦想的终
点,大家一起不放弃
自己的梦想! 共勉!
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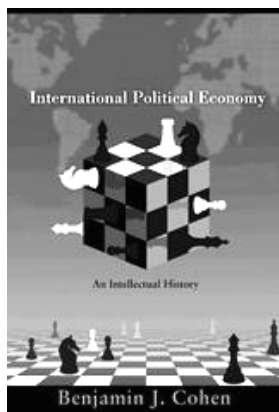
国际越来越美
国际的人越来越
精彩
宋琳

新书架



迈尔斯·卡勒主编：《网络政治：施动者、权力与治理》，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9年。(Miles Kahler ed.,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尽管“网络”对于当代国际关系来说并不陌生，但是绝大多数时候，“网络”仅是一种比喻式的概念，而不是作为一种系统分析的工具。那么如何将新出现的网络分析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呢？网络分析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有何突出优点？网络是如何产生权力进而影响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本书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对上述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本书介绍了两种网络分析路径——第一种是将“网络作为结构”来研究，即网络结构对网络成员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效应；第二种关注于作为行为体的网络，网络作为与市场 and 等级组织相对应的具体组织形式——并将其运用到包括国际不平等、国际人权运动、互联网治理、恐怖主义等国际关系研究中，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结构分析视角。



本杰明·J·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部思想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Benjamin J. Cohe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社会及政治秩序出现巨大转变，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反映了经济与政治的分野。科恩教授的这一专著讲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建立至今的历史，描述了一代立志逾越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鸿沟的先锋学者的个性及所处历史环境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包括基欧汉、吉尔平、卡扎斯坦、克拉斯纳、考克斯、金德尔伯格及斯特兰奇。并探讨了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共同基础及对立的世界观，力图寻找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缺失环节。书中首先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及英国学派，而后提供了对霸权稳定论（HST）、体系变革、控制差距、国家角色转换的全面评述，接着描述并试图回答在这一领域出现了近四十年后“我们知道什么”的问题，最终提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路径。



克里斯·布朗、克尔斯滕·安利：《理解国际关系》（吴志成、刘丰、刘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Chris Brown and Kirsten Ainsley,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理性选择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假定国家处于一个预先给定的情景之中，它研究的是国家在无政府世界中作为理性利己主义者如何博弈的问题。但在全球化时代，其“国家中心主义”的倾向遭到了信奉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家们的批评。克里斯·布朗教授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从国际关系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流变、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全球治理和全球性问题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等多维视角出发，评述了这两派观点，对国际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作了横观纵览似的扫描。这部国际关系学科的导读性著作，既可供普通国际关系学习者研读学习，也可提供给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作政策参考，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瓦西利斯·福斯卡斯、比伦特·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薛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Vssilis K. Fouskas and Bulent Gokay, *New imperialism of American: Bush's war on terror and blood for oil*, Westport and London: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5.）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缺乏明确的界线和规则，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来说，它尽管拥有无可匹敌的控制能力，却始终找不到表现自身实力的对应点。9·11之后，对共产主义的长期战争已经被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所取代。两位英国国际关系学者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新帝国主义”外交思想的延续、演变及可能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努力从所有骚乱和动荡的表象中揭示出一些深层的变化，并以此开辟一个新的讨论领域，即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世界并对此作出反应。作者从现实角度巧妙地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在世界上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秩序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安全，同时告诫政府由于军事力量的过度延伸，美国正逐渐陷入一个深度危机时期。为了减轻盟友和敌人的忧虑，确保“自由世界中心”地位，美国应该学会克制。

学术交流

沈大伟：展望与回顾新中国外交政策 60 年

4月16日下午，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主楼 425 为南开师生带来题为“新中国对外政策 60 年：回顾与展望”的讲座。讲座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杨龙教授主持。



沈大伟教授以自己在南开的求学经历开场，言及时隔多年重回南开的所思所感，在谈笑风生间拉近了与听者的距离。随后他简要梳理历史，以 1978 年为界将新中国外交划分为两个阶段，并结合其在中国八年的所见所闻，为听众展现了一名具有丰富外事经验的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外交政策。他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的积极成果，尤其是中国在外交外事战略上的积极转向；谈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对外交流交往上的面貌的转变，他的感慨与欣喜溢于言表。但沈大伟教授同时强调，在当今世界中国只是作为一个“global actor”，而不是“global power”；中国文化底蕴深厚而富有独特韵味，但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外事宣传等“软实力”方面仍有欠缺；如何更好地正视和处理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差异，增进了解与认识仍有待中外中外学者专家的共同探讨和推动。

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沈大伟教授以其坦率真诚、幽默风趣深深感染了在场师生，在热烈的互动与融洽的气氛中为南开师生带来学术洗礼与思想启迪。

李容彬：共论“中洋”国际政治

4月19-21日，中国外交学院访问学者、原印度防卫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李容彬（Itamar Y. Lee）先生来访南开，并围绕“中洋国际政治”概念为南开师生做了连续三场的学术讲座。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杨龙教授致辞欢迎，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王翠文副教授主持了讲座。

三场讲座紧密相扣：首场题为“中洋国际政治：以三中关系论新时期国际关系研究”，李教授以“三中”关系（即中国——中亚——中东关系）为基础，提出“中洋国际政治”新概念，以探讨中美关系的新焦点；在第二场中，他以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出发，围绕“盲人摸龙：印度视角下中印关系的过去、现状及其未来”的主题讲述了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并精要得出了“中印矛盾的关键在于沟通不畅；要解决矛盾，就必须加强双方交流”的结论；最后，他从“亚洲伙伴还是全球对手：美国对中印关系的看法”的独特视野切入，提出美国的战略



在于“以亚治亚”；中印两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因此需发掘合作空间，共同促进亚洲的和平。讲座期间，到场师生无不深为李教授的大家风范所折服，其开阔的国际视野、深刻的学术见地博得了南开师生阵阵掌声。而他以“作为亚洲人，我想要和平，不想看到冲突”“仁为贵，和为贵”等作结，更体现了其对于“中洋”各国和平与发展的真挚情感与深沉希冀。

学术活动

张睿壮教授应邀出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 2010 年年会并当选为副会长

4月17日至18日，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承办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0年年会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召开。来自国内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名国际关系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年会。我系张睿壮教授应邀出席，并当选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此次年会以“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形势及中国外交”为主题，在为期1天半的时间里，共举行了3场主题报告和8个专题讨论，规格高、规模大、内容广、亮点多是这次年会的4大特色。年会对于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为我国对外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学生活动

06级国政篮球队校区告别赛



6月2日，06级国政篮球队与07级国政篮球队在迎水道校区举行了一场友谊赛，这也是06国政篮球队的告别演出。06国政前队长刘秀汀火线复出并砍下全队最高分30分，但无奈整体实力不济，球队最终以大比分落败。07国政的张家福表演抢眼，全场斩获40分，获得比赛MVP。临近毕业，能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对即将离开的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一段珍贵的记忆，06国政

现队长杨林赛后也对07级的学弟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主办单位简介

院系简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始建于 2003 年 6 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本系拥有一支少而精的师资队伍，目前有教授 4 人（其中博导 3 人）、副教授 1 人、讲师 8 人，现任系主任为韩召颖教授。此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韩国前任总统金大中、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沃尔兹为礼聘名誉教授。本系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三个专业的硕士生和国际政治理论方向的博士生，现有本科生 160 余名，研究生 40 余名。本系除开设政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外（如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方法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还开设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比较政治制度、外交学、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等专业课程。南开大学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

本系培养具有一定政治学素养、掌握有关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特别是具备独立学习和工作能力的人才，让他们今后能在党政机关、新闻媒体或企事业单位胜任外交、外事、对外宣传、国际交流、国际商务等方面的工作，我们同时也向高校和研究部门输送优秀毕业生，使他们在进一步深造后成为从事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教学和研究的**高级人才**。





老师简介

张睿壮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学术委员会委员。1997年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博士)，师从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先后任美国多米尼肯大学客座教授(1997)、韩国天主教大学客座教授(200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客座教授(2005)、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2007-08)。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等，在国内外主流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吴志成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新闻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欧洲政治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1966年5月出生，先后赴德国汉诺威大学、曼海姆大学、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留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和高级研究学者)，并多次赴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新加坡、蒙古、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目前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欧洲问题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教育部、外交部、欧洲联盟委员会、国家留学基金委、天津市和南开大学社科研究项目20余项，获各类省部级和学校学术奖励20多项。出版《治理创新：欧洲治理的理论、历史与实践》等论译著10余部，在多种权威核心期刊发表各类论译文共计1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社等转载10余篇。



韩召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1968年出生，山东省莱州市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著作有《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专著）、《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译著）、《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合译）等，在《美国研究》、《外交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赵龙跃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世界银行国际贸易政策咨询专家。曾长期在我国政府部门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和国际合作工作，多次直接参加国家相关经济政策、国务院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公开发表论文和评论多篇，主要论著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WTO与农业管理体制》和译著《国家主权与WTO》等。曾应邀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做研究学者，专门从事WTO法律文本和美欧贸易政策法律的学习研究工作，获得乔治敦大学《世界贸易组织专家证书》。近年来，主持完成研究课题“在WTO框架下的非市场经济问题”、“争端解决机制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国经济贸易增长模式”等。

王翠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2002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6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举办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2006年8月参加外交学院与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谈判的讲习班；2007年7月到9月赴英国伯明翰大学访问交流。主要研究领域：力求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框架下研究拉美问题，包括拉美的政治经济转型、拉美与美国贸易一体化的政治分析、中拉关系等方面。曾参与编写《发展政治学》（杨龙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先后在《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1971年8月出生，新疆乌鲁木齐人。先后在新疆大学获得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6年至今，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获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2009）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亚洲研究中心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专著有《俄哈关系论析》，合著有《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南开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徐振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1979年11月出生，山东寿光人。199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2002年进入历史系学习，先后获法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2007年起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代表性专著有《美国对欧经济外交（1919-1934）》。在《现代国际关系》、《南开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1981年10月生于湖北荆门，2009年在南开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冷战后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专著有《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2010），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理解国际关系》（2010）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科学》和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和译文三十余篇。

袁燕，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



阎梁

经济理论》(2010)。

出生于陕西省，汉族。先后在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1-2005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国际危机管理、世界贸易组织等领域的政策研究工作。2009年起，受聘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代表性论著有：专著《社会危机事件处理的理论与实践》(2003)，教材《国际关系分析》(2008)，译著《战争与和平的经

刘兴华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外交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1980年9月生，分别于2003年、2006年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7至2008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资助，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留学。2009年起在南开大学任教，先后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外交评论》、《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

霍特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1972年出生，天津人。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08年任教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国家战略、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合著《东亚国际关系格局1894—1945》。

黄海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197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吉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南开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研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等，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

国际关系学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五，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著作

1. 专著：著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8 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 109-117 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2月10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2月14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第 165-176 页。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学系

征稿启事

本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办，现面向广大师生长期征稿：

一、引介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学术论文、书评及新书架栏目。

学生习作：传播研究成果，加强学术争鸣。论证严密，语言流畅，标点符合规范（参考国际关系学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当以 3000-8000 字为宜。

书山有路：品茗大师杰作，抒写我辈见解。不是随意的感想，也非勤奋的摘抄，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严谨客观是首义，独立见解为二德。3000-8000 字为宜。

新书架：放眼全球，把握书界动态。以笔传神，通晓新书梗概。投稿请注明作者、中英文书名、出版社等，以 250-300 字为宜。

二、关注国际时事动态，“煮酒论英雄”。

青梅煮酒：天下大事谁是英雄，功过是非国关热点任君评说。投稿长短不限，仅盼观点鲜明。

三、搭建广大师生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包括“他山之石”、“院系新闻”栏目。

他山之石：经验交流，心得汇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字数不限，畅所欲言。

院系新闻：或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沙龙，或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社会实践。欢迎报道院系活动，展示院系风采，200-500 字为宜。

这是一个飞扬着激情与梦想的舞台！

在这里，你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这里，你可以畅游天地，飞跃古今；在这里，你可以重塑思想，锻造灵魂！

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今时的国关学者对话；在这里，你可与所有不远的国关研究共行；在这里，你可与所有未来的国关方向同步！

这是一本杂志，但它的读者也是它的作者；这是一部刊物，而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话都是夸大其词，那么，请你拿起你手中的笔——因为只有你，能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来稿请发送至 nkirjournal@gmail.com.

◆老师寄语◆

希望《新视界》成为学生专业学习
交流的同地，思想碰撞的舞台。

韩召颖
2010年5月

愿《新视界》成为知识之海，
思想之窗。

王翠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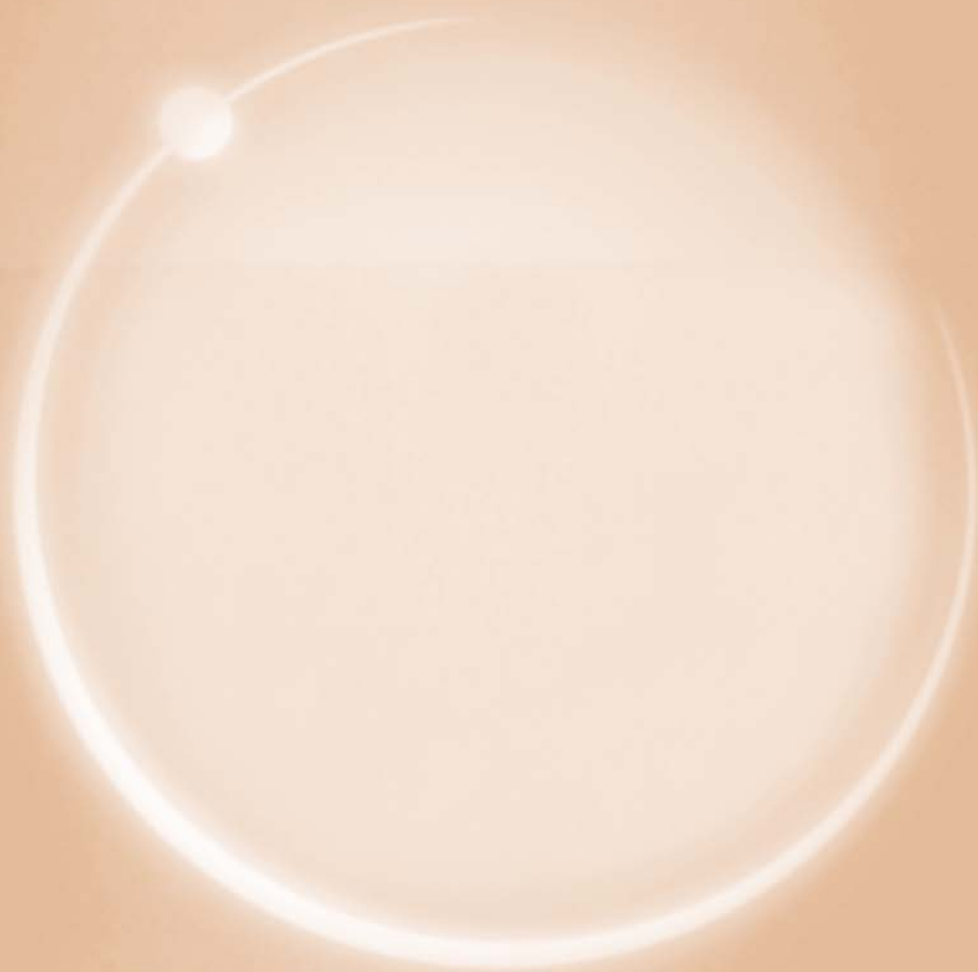
愿爱好回头的同学们
勤读、多思、常写，办好
这份刊物！

刘丰
2010年5月

科学进步，人文日新！
——祝贺新视界问世。
润梁 2010年5月19日

◆编辑部合影◆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学系 主办

